

第一章 略說資本主義

一、資本主義的特性

談到資本主義 (capitalism)，一般的研究都大抵同意是在十三、十四世紀中，首先出現在義大利半島的一種經濟生活方式。但是這一名詞的產生和廣泛使用卻一直要到十九世紀之後。

最初使用資本主義名詞者為法國社會革命思想家布蘭 (L. Blanc)。一八四一年，他在「進步評論」雜誌上，發表一篇「勞動組織」的論文，將少數以資本排他而為獨占狀態者，謂之資本主義。在一八七〇年德國經濟學者修弗列 (A. Schättele) 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及一九〇二年宋巴特 (W. Sombart 1863—1940) 著「現代資本主義」後，資本主義名詞才廣泛的使用。資本主義概念，從未有一定的規定，以最善於說明資本主義現象的馬克思 (K. Marx)，也沒有下過明確的定義；只敘述資本主義之特質，並且他也沒有使用「資本主義」一詞，而稱為「資本家的生產方法」(註一)。所以說，什麼叫資本主義？實在是一

個看似容易又極難回答的問題。

由於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在一種特殊和複雜的時空條件下，各種持續性因素相互影響所交織成的歷史複合體。所以有關資本主義這一名稱，雖有無數學者一再的爭駁辯論，卻從沒有產生過一個公認的定義。而且自從資本主義興起後，也經歷了很多的轉變，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區，都有著不同的意義和面貌。

然而資本主義不論如何演變，其中有幾個基本的要素是一直沒有改變過的。這幾個要素或可說明一些資本主義的特性。而對這些特性的掌握，或將有助於我們在進入這一繁複的歷史複合體之前，不至於被攪得眼花撩亂。

第一，私有財產制。就是私人有權擁有及支配他自己的財富。這是資本主義的特色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個。我們可以說，其它的特性都是從這裡所衍生出來的。

從歷史上來看，所有的文明社會，包括初民社會，都以不同的形式建立了私有財產制度。我國的孟子也早就強調「有恆產者有恆心」。當然，這些私有財產制，也會在某些時期遭到破壞，然而這一制度卻是源遠流長。近代資本主義則把財產權建立在更精密的觀念系統和法律體系之上。這種觀念和法律至今也成為現代人所普遍認同的。

第二、經濟自由。什麼叫自由呢？自由就是選擇的範圍或幅度。自由的大小可以拿選擇的限度來衡量。如果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那就完全沒有自由。而世界上完全或絕對的自由也很少，因為人非萬能，受到各種客觀和主觀條件的限制，無法隨心所欲，所以選擇本來就是有限度的。而所謂的經濟自由，包括了消費自由、就業自由和企業自由。消費自由是指消費者自己有權決定購買那些商品，就業自由是指選擇職業的自由，企業自由是指生產者自己有權決定生產那種產品的種類和數量，以及用什麼方法生產。

這種經濟自由，事實上也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後才成為可能。舉例來說，在中世紀歐洲的封建時期，貴族或領主都是守著自己的地盤，仰賴其所畜養的農奴耕作以維持經濟；以及如中國過去封閉式的農業社會和非洲的部落社會等等，基本上都缺乏上述這些經濟的自由。可以想見，這些經濟自由必然祇有在特定的經濟環境和條件下才有可能存在。即使是當代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從生產到消費的活動大抵皆由國家所計畫與推動，故所謂消費、就業與企業等自由事實上也不存在，所以仔細想來，這一項因素的具備也不是十分容易的。

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照理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思，從事各種活動。然而個人的活動應如何組織、如何調和，才能避免妨害社會總體的自由，甚至於達成社會總體的目的呢？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每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為了自己的目的而選擇，如何能夠達成社會共同的目的呢？贊成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則認為這就要靠資本主義的第三個特質——價格機制 (price mechanism) 了。

第三、價格機制。支持資本主義制度的學說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為了自己的

目的，追求自己利益的活動，係透過價格機制的運行，運行的結果，不但符合個人利益，同時也可以達成社會公益。

關於這一點，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 在他的「國富論」(一七七六)一書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每個人都不斷努力為其所能支配的資本，尋求最有利的用途。他心中所想的，誠然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會的利益。然而研究其自身的利益，自然甚至必然導使選取對社會最為有利的用途。」

他又說：

「他通常誠然並沒有意思去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這樣做)究竟促進了多少。當他決定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支持國外產業的時候，心中所想的只是本身的安全；當他採用這樣一種方式經營產業，使其產量達到最大價值的時候，心中所想的只是本身的利益。他在這一情況，和在很多其他情況下一樣，由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引導，達成了一種無意達成的目的，透過他對本身利益的追求，往往比真正蓄意去做時，更為有效的促進了社會的利益。」

亞當·史密斯所謂看不見的手，指的就是價格機制。資本家對物品的生產數量和類別，完全受到該物的利潤而定。某種物品需要量大增時，在物以稀為貴的原則下，價格必然上漲，這一上漲必將刺激更多的資本投入生產，一直到這物品的供應量和需求量達到平衡為止。如

果這一物品到了供過於求的情況，其價格必然下跌，這一情況將迫使原先投資者的資金流向另一個比較有利可圖的產業中，這樣的資本流動，可發生在國內，也可發生在國際間，決定它走向的，就是利潤率，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價格好壞(註二)。

所以概括的說，資本主義可以說是一種在自由市場中相互競爭的私人企業所組成的經濟體系。它講求經濟效率與自由，以此為經濟的發展原動力，並間接地導致了政治自由。這也就是說，商人在追求經濟利潤的同時，如果遭遇到政治的干預，他必然要極力加以排除和解決，否則從長遠來看，商人是無法持續累積他的財富的。中國是一個極典型的例子：政治的廣泛干預，使得商人階層無法在歷史上取得優勢地位，也因此地區性的市場經濟存在著相當的局限性，無法像歐洲那樣有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

然而一般說來，有關上述這些正面的論點不過是一種理想，在現實世界中是很難圓滿實現的。這也就是說，社會中每個個體都在追求其個別的經濟利益之同時，不必然都會對社會公益產生正面的效果。「強凌弱，眾暴寡」和聯合壟斷的情形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而政治對經濟的干預也從未在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中停止過。

約在十九世紀中葉後，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歐洲社會呈現了兩極化的現象，一方面是以資本家帶領的工業發展，把人類的物質文明進一步提昇。然而另一方面，由於資本家的剝削，勞工的生活水準每況愈下。於是有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的興起，這些理論主要是從勞

動者的立場出發，試圖解決他們所面臨的種種困境。而支持資本主義的一些理論家則企望站在改革（而非革命）的立場解決當時兩極化的現象。但是總體說來，當時的理論所展現的大抵是一種悲觀的論調，咸認資本主義的發展，最後不免走向停滯的局面，這種悲觀的看法，主要是根據馬爾薩斯（T.R.Malthus）的人口論和李嘉圖（D. Ricardo）的地租論。我們在此祇舉馬爾薩斯的見解，他認為由於情慾的驅使，人口如果不受限制，每隔二十五年，至少可呈幾何級數的增加，然而糧食每隔廿五年最多呈算數級數的增加，因此如果人類不自行約束，人口之增加必然受到食物的限制。

在十九世紀末，貧困一般被認為是資本主義貧富不均發展的結果，在這樣的一個認知之下，自由的觀念不再是唯一的價值，平等、人性尊嚴、道德的完整等理想應運而生，而一般人也開始主張資本家與政府應該要負起照顧窮人的政治義務。這樣的理念，後來也逐漸為歐洲各國政府所接受，所以各種福利措施、租稅政策和社會救濟等辦法都被提出以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

另一方面，歷史發展的結果，顯示了廿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像十九世紀那些經濟學家所想的那麼糟，過去所想的人口問題、土地開發問題都在相當程度內被解決了不少，這主要原因是，生產科技進步，提高了土地的生產力。再者，工業和服務業的比值也逐漸超過農業，而使土地開發運用的問題嚴重性降低。另一方面，世界落後地區的不斷開發，也提供了

先進國便宜的糧食和原料，也同時增加了貨品的國際銷售市場。

雖然如此，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之下是否會達到停滯的局面呢？有關這一憂慮，到了廿世紀仍為不少有識之士所重提。一九七〇年代以還，羅馬俱樂部先後出版了「成長的極限」和「在轉捩點上的人類」兩書，就是為自然資源的短缺發出警訊。這個課題所衍生的還包括生態維護以及人類往何處去的問題。因為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中，人類的生產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這個以利潤為動力的體系，正不斷驅使人們去開發他們周遭的資源，而這體系當中是否有另一種機制來平衡或減緩這個難題呢？相信這個問題的思索，可能更需要訴諸於人類的理性與智慧了。

除了上述的課題之外，世界上國與國之間的不均衡發展，也就是有的國家可以發展的很好、有的國家則經濟毫無起色的問題更為有識之士所關切。這種情形也與資本主義的全球性發展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當然，這其中的理由十分複雜，很難一語論斷。但是窮國歷來與富國間的貿易往來，事實上遠非自由經濟理論所描繪的那麼美好，如「相互獲益」之類的話。因為窮國一般祇能輸出原料及低級的產品，所以無法與富國的高科技產品競爭，這也導致了國家間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結果。這一點也部分說明了為什麼一些亞洲、中東、拉丁美洲的國家對歐美先進國的資本主義體制總存有歷史性的敵意。

如果你看完上述的說明後，就以為已經了解了資本主義，那未免把它看得太簡單了。定

義和特徵的介紹，祇不過為了防止讀者在閱讀中迷失方向所提出的一些指標。如果你誤認這些指標就是答案，那就無法進一步認識在歷史洪流中的資本主義更深層的意義了。

二、資本主義的發展分期

以上係先就資本主義的意義和特質加以解釋，可說是一幅橫剖面的示意圖，這些特質當然不是一時間就完備的，它是在歷史中長期醞釀而成的。如果專就縱剖面——歷史面來看，則資本主義在每個時期都有著相當不同的面貌，從這些不同的面貌中，我們可以進一步去體會上述這些特質的深層意義和歷史性格。

如果暫且先不論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十五世紀初，此時期大抵是以農業為主的初期資本主義型態，長程的商貿逐漸發展之中），自十六世紀迄本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自十六世紀至一七五〇年，經濟的主要型態為商業，即西歐各國的「重商主義」。這也是工業革命之前的型態，其主要特徵為小規模生產單位、手工生產為主，其中還包含著濃厚的傳統色彩和封建制度的精神。當時社會組織結構係由工匠行會、非正式關係以及非科學的產業和貿易所支配。貿易上由商人購置工業者已生產的商品，進而前者向後者訂貨或指定應行生產的商品種類，甚至於對生產者貸放資金供給原料以求獲得更大的利潤。而在國際上，當時通往印度航路和新大陸的發現，交通、貨幣與貿易相互促進發展。結果促使中世紀固守一地的封建經濟崩壞，領主和諸侯勢力衰微，專制的統一國家確立（即現代民族國家之原型），國民經濟形成，這些新成的國家，莫不極端重視金銀，以為富國強兵之本。因之，都採高率關稅和限制商品輸入，防止金銀外流；一方面則以補助金獎勵輸出，換取金銀流入。當然到了較後期，由於工廠手工生產力不斷增進，信用制度發達，貨幣轉化成資本的背景，使得貿易順差的理論（亦即出口額高於進口額）逐漸取代了原先素樸的拜金（銀）思想。這個時期的強權有幾個，首先是十六世紀的西班牙、葡萄牙；接著則是十七世紀的荷蘭。

第二時期是自十八世紀下半期至十九世紀後半期，由於工業革命，家庭手工的生產變為工廠機器的生產，生產力與生產組織起了根本的變化，經濟的主要型態遂漸由商業變為工業，主要的特徵為合理的決策和營利競爭的商業精神，早期的封建及傳統態度業已消失無踪，生產組織由生產手段所有者之資本家與企業經營者之企業家，以及受僱傭之勞動者三方面所構成，並逐漸演進至企業家為生產的中心。產業所有與產業經營分離，生產的營利目的益形顯著。而隨著資本之增殖，社會財富亦大為增加。由於工業革命主要是在英國首先發生與完成，慢慢才擴展至西歐其它國家。所以本期自以英國為最大的強權，由於加上其海島的地形，促成它往海外擴張的意志與本錢，所以英國獨霸於此期的作為也有異於前期的西、葡、荷三國，

這些我們會在往後章節中加以介紹。

第三期是自十九世紀末葉至本世紀末，由於金融組織的發達與制度的健全，社會資金的借與貸皆經金融家（銀行家）之手，以受信與授信的形式，使社會個人與團體的經濟行為均依靠信用以為進行。經濟的主要型態不得不由工業而兼具金融。這個時期，美國取得了優勢地位，不止是它的國力和軍事，過去數十年中，我們大概對美國紐約「華爾街」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應有或多或少的耳聞與理解。這一點也顯示了美國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象徵意義和實質內涵。當然相似於十九世紀的英國倫敦，美國紐約說不定亦將步其後塵而被其它金融重心取代了領先的地位。是歐洲或是亞洲的某個歷史上新興的城市呢？我們姑且拭目以待。

資本主義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一方面展現各種時代風貌，但也依舊維持著某些本質，它給人類帶來了幸福，也帶來了災難。幸福是社會財富增加，物質文明昌盛；災害則是貧富階級對立，窮國富國關係緊張以及經濟恐慌的慘烈。愈至近代，其牽連性則愈深。很多學者認為資本主義的制度作為提高人類生產力的功能而言，已經盡了它的歷史任務，其發展已到了盡頭。德國學者宋巴特在其所著「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將資本主義分為商業、工業、金融三個歷史階段，並斷言資本主義至後期就要沒落，其它學者如馬克斯等也有類似的見解。

資本主義是否已經沒落了？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以一九三〇年代的全球經濟大恐慌時期作觀察，資本主義在當時受到了許多的批評與預言，甚至有表現出與資本主義立場相左的行動出現——如防制托拉斯、社會福利立法、工會的成立等等，但是資本主義後來卻又以修正的面貌，頑強地生存發展至今。

由於美國是本世紀中葉以後資本主義的龍頭大哥，所以我們就以它的修正簡要說明，美國用什麼方法來解決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兩大危機：景氣循環和貧富不均的問題。歸納而言，有下列數點：(一)其企業內部實施所有權分散、支配分散，也就是說以持股方式讓更多人當老闆；而決策方面也更民主，尊重勞動組合和公共利益。(二)政府推行充分就業政策、實施社會安全制度，並規定最低工資且不斷提高勞動者的待遇。(三)本世紀美國資本主義體制係依存少數的大公司活動，遂行其大規模的生產。這種大產業不是由個人的能力所能獨力擁有，但在這樣的規模下，又將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經營與所有權，在小企業、家族企業（台灣佔絕大多數）和過去歐洲的資本家都是統一的。但在現代的大股份公司卻可一分为二。企業大有大的好處、小有小的優點，不能一概而論。譬如說大企業可大量生產，但在產業升級的調整上有時困難重重。總之，這是本世紀中美國資本主義的特色。(四)透過與國際上其它國家的政經往來倡導自由貿易，加強其先進產品的輸出，或以跨國公司的方式（後詳）發展（註三）。當然，上述這些修正仍需要適當的國際環境與工業條件配合才有可能成功。如二次大戰結束後，各國經濟成長率增高，有的比戰前增加二至三倍。這是由於戰後復興的需要，激勵經濟

的開發與進步。另一方面，現代科技進步提高了生產力，促成新興產業和經濟的變遷，同時戰後半世紀以來，在經濟上雖曾出現過幾次輕微不景氣，但沒有發生重大的恐慌，而且社會經濟比較安定，當然美國在一九七〇年後國勢已不如往昔，開始走下坡了。這主要還是歐洲與東南亞國家與之經濟競賽的結果。總而言之，本世紀的資本主義透過自身的調整，並吸納了許多原先屬於社會主義的政策和理念，同時透過更進步、更深入的國際分工等方法，復加上科技的進步和國際社會環境的配合等因素，使得資本主義在本世紀仍屹立不搖，儘管它遭遇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對抗，但在本世紀末，我們仍舊見到了它的潛在力量間接促使了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個改絃易轍地接受它。

以上簡短地說明了過去與現在資本主義的輪廓。然而，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提到的：資本主義是一個複雜的歷史複合體，我們不可能在短短的一些定義中完整地掌握它的全部意義。歷來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學者，有學經濟的、有學政治的、有學社會與歷史的。他們都從不同的角度去詮釋什麼是資本主義，而且各有各的發明，真是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上高天無一同。」另一方面，許多學者更認為這是一個充滿了政治氣氛的字而拒絕使用它，而這一名詞廣泛地被使用，還是本世紀的事。英國歷史學者克拉克 (Sir Geroge N. Clark) 就說過：「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去籠括現代經濟制度，是十九世紀中葉社會主義者所發明的辦法」。因為社會主義者看到了古典資本主義的畸型發展，造成國內貧富不均、人性的墮落，

國際的強凌弱、眾暴寡的現象，遂想用種種的社會主義來代替它。所以主張社會主義的人，
給了資本主義負面的解釋，相反地，擁護資本主義者則高舉著旗幟來歌頌它的優點。

本書因此希望從一種偏重歷史社會學的角度，比較客觀的來說明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如何產生，為什麼會產生以及如何運轉的課題。我們希望能兼採諸家的見解，兩面俱呈地讓讀者可以很清楚地了解這個大家幾乎耳熟能詳的名詞，到底指的是什麼？

底下文章的安排是先探討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如何萌芽 (第二章)，以及它如何在歷史上展現不同面貌 (第三章，我們僅說明到十九世紀的末期)。接著是從結構上將資本主義作內在的分析 (第四章)，說明它運作的形式和原因。在以上的脈絡中，雖然已稍能說明資本主義的歷史意義，但為了使讀者能夠看到不同的觀點，我們特別加入幾個有代表性的學者意見 (第五章)，我們舉韋伯的看法來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作另一種不同角度的陳述，另外，並以馬克斯的論點，協助讀者更進一步了解資本主義運作以及可能覆亡的理由。當然，任何一種理論都必須接受事實的考驗，是故馬克斯論點的特色及缺點，文中都將以具體的歷史經驗來檢視它。最後，我們則進一步探究資本主義在廿世紀的發展面貌，希望在本章中能提供讀者當今世界的部分參考藍圖。

底下先論及資本主義的形成過程。一般共同的想法，是認為其興起應歸因於十四世紀前後瀕臨地中海的義大利城市，而其中一馬當先、發其端緒的是威尼斯。說到這個歐洲資本主

義興起的大轉變，我們必須把西歐在十四世紀之前的背景加以簡單的介紹，如此才易於掌握整個變遷的實質意義。這也是下一章所要說明的。

附註

- (一)高叔康編，經濟學新辭典，台北三民，民國76年六版，頁四八五。
- (二)孫震，「民生主義研究」，載於周道濟等合著，三民主義研究，政大公企中心，民國71年初版，頁七四八—七五一。
- (三)同註一，頁四八九—四九〇。

第二章 歷史上資本主義產生的契機

一、歐陸商業的復興

整個西方世界在羅馬帝國崩解（西元四七六年）之後，由於日耳曼蠻族的南侵，從五世紀到第九世紀，這四五百年間是歷史上所謂的「黑暗時期」。而西方文明之發源地，地中海盆地，在七世紀中葉回教徒尚未侵入之前，該處藉著地中海之便原已有繁榮的商場與貿易活動，但是七世紀中葉後非洲、義大利與東方領土（東羅馬帝國所屬）全部陷於回教徒之手，回教徒征服了這個歐洲內海東西南三面，使得原先得勢的基督徒再也不能於地中海上自由往來了。總體說來，由於城市大都被破壞，八世紀末整個歐洲已倒退為一種原始純粹的農業狀態中，而日耳曼蠻族大遷徙進歐陸之後，在羅馬帝國舊有的地盤上實行的采邑分封辦法，與逐漸形成的農奴制度結合了起來，後來就產生了一種上下相連的社會體系。在這種社會體系中，皇帝或國王高踞於最上層，中間計有各種爵位不同的貴族，最下層就是人數眾多的農奴，形成一種金字塔式的封建制度。從九世紀到十三世紀間這種制度已然成熟，史學家布洛克

(Marc Bloch) 則稱之為封建主義時期。

其中，八世紀後的農業狀態原先大抵是一種自給自足的方式，也就是說，大多數的人都是生產他們自己所需要的食物，當然其中也有小部分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和非農業生產者交換東西。這種狀態一直維持到十一世紀。但是從一一五〇年以後，歐洲已逐漸生出一種「間接的農業消費」型態，換句話說，農業生產已不僅僅是為自己日常生活之所需，同時還進一步是為了去交換或者以之從事貿易的一種手段。這樣地將農業產品當作一種商品去賣，無論在東方或西方都是一種相當緩慢而漸進的過程，從這個角度看來，十二世紀後封建時期的莊園經濟（所謂莊園，就是當時歐洲農村大都以貴族的邸第或教會的教堂為中心，鄰近集居著許多依附貴族或教會保護的農戶，所形成的自給自足的農村，就叫做莊園，其中農奴就向領主租地耕種，並繳納租稅）與上述這種商業交換經濟是並存的，當時交換的貨品主要是以食物及手工藝品為主。

歐洲本土的經濟活動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可說是受了兩種因素的影響：第一種因素是從封建制度本身所產生的；另一種是受到南歐及北歐商業氣氛的感染。我們先來看看第二個因素。

歐洲本土在十一世紀末開始確實感受到了兩股商業運動的壓力，因此才漸漸有商業復興的跡象；並且，也由於有商業復興，才使得封建體制逐漸地式微，這兩個商業運動分別發生

在歐洲南北邊境的沿海地區：一個是地中海西部和亞得里亞海，另一個則在北歐的北海和波羅的海。

和北海。前者的主角是威尼斯商人；後者則是斯堪地那維亞人（註一）。威尼斯在西元一千年後才開始擴張到亞得里亞海，並介入近東的貿易，其船隊往地中海東部發展之際，正逢十字軍東征（從西元一〇九五至一二七〇年，共有八次東征）。初期十字軍採陸路，後則加重海運的支援，隨著東征的發展，貿易和文化交流也隨之熱絡起來，威尼斯不但從事東西方的貿易，也為十字軍造艦。西元一二〇〇年間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使得威尼斯更擴張其海外殖民地，威尼斯儼然成為一個商業王國。雖然到了西元一四〇〇年後開始走下坡，但是威尼斯的商業文化與精神卻給了歐洲大陸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十字軍東征之旨固在護教而與回教徒作戰，但冒險擴張之企圖仍大有之，所以他們也順道侵略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帝國），進掠希臘人在中東的屬地，其範圍包括敘利亞及以色列沿海各城市。沿岸都市對地中海海運的通暢無阻十分重要，所以十字軍在此處所建立的國家，就對城市有著特別的關注，這些十字軍所建立的國家都會賜給這些城市相當多的特權和便利。海港商埠，從十一世紀十字軍東征後，也就陸續在地中海沿岸地區建立起來，這大抵是這些國家給城市的協助之一（註二）。所以歷次十字軍東征的結果對義大利各個都市而言，是替他們帶來了地中海的統治權和商業上更大的自主性，這種以商業都市為中心的統治權恰好與歐洲大陸封建莊園為重心的經濟情況，形成了相當明顯的對比。義大利的都市，除了威尼斯之外，其它如米蘭（Milan）、佛羅

倫斯 (Florence)、波隆納 (Bologna) 以及納布勒斯 (Naples) 等都是相當著名的。在義大利的都市中出現了資本主義的雛型，這些自由城市以累積資本為目的的長程商業活動及生產方式，在當時封建分權、政治干預較少的情形之下（尤其是威尼斯孤懸海上，所受影響尤少）逐漸成型。而這種資本主義精神的經濟活動，不僅在當時宰控了地中海貿易，並且也在十三世紀後，逐步地把他們的產品運往中歐和地中海東岸銷售。十字軍東征的目的不全在商業，但卻也促成了一度中輟的商業再次復興。而這一蓬勃的商業氣氛也漸次地影響了整個歐洲。

正當南歐商業文化逐漸開展之際。低地國的中歐（即約略是今日比、荷、盧等國）也與北歐有了更多的商貿交流。早自日耳曼民族南侵之後，低地國處的商業就日盛一日，主要是拜地利之賜，當時的尼德蘭 (Netherlands)（包含現之比、荷兩國），位於萊因河下游，為地中海與北歐諸國交通之要道，一方面又瀕臨北海。就海運而言，位置又最適中，其商都有安特衛普 (Antwerp)、布魯日 (Bruges)、利愛日 (Liège)、根特 (Ghent)、布魯塞爾 (Brussels) 等皆為當時之核心（註二）。商人來自多處，具有冒險犯難精神，從阿姆斯特丹至波羅的海，從海路、河道或陸路皆為便捷。十世紀後，北方斯堪地那維亞的海盜，也逐漸收斂劫行而致力於商貿。蓋海盜一行風險極高，不如經商厚實，約在十世紀末，北歐的商業，已使法蘭德斯 (Flanders)（約在阿姆斯特丹西南，為現今比、法、荷之交界）、北海以及

波羅的海諸國連成一氣。尼德蘭商業盛極一時，主要產品有毛織品、黃銅和銀器，還有更

遠銷地中海一帶。由於南北歐及中部沿海城市的商業復興，使得歐陸孔道上的城市相繼林立，商人在歐陸之中運有送無，利益大過原有依分封采邑而食的封建莊園經濟。另一方面，在十二世紀之後，貨幣、支票及匯票亦已通用，物價因之日漲並波及田制，也間接促成了農奴的逃亡，而農奴的地位也因封建地主的優待安撫而日漸提升。約略而言，這一商業脈動，已鬆動了莊園經濟的基礎。

二、威尼斯的例子

從上面約略可知，歐洲南北兩地的商業城市的興起，的確給歐洲舊有的體制帶來很大的衝擊，但是我們比較深入的了解這些城市究竟與當時歐洲有多大的差距，則必須從個別的城市去理解它，威尼斯就是一個極典型的例子，從這個城市的一些情況，我們又可以進一步了解資本主義興起的一些內涵。

一般研究資本主義的學者，大抵皆承認其根源始於十四世紀前後的義大利。在當時由於教皇與西羅馬帝國的爭權，使得義大利半島上好多城市，在其雙方顧盼不及的狀況底下獲得相當的自由，逐漸擺脫了中世紀歐洲封建社會的束縛，而其社會生活的空氣也顯得活潑進取

許多。從另一方面看，在十三世紀時，西北歐與南歐的交通網路並未十分暢通的情況下，這兩個區域主要由經過西尼斯山 (Mont-Cenis) 與辛普倫隧道 (Simplon Tunn) 的陸上交易線相連，一直到一二七七年才由熱內亞人打開地中海到布魯日的定期航運，因此這當中，尚未有一個城市夠資格稱得上是歐洲的經濟核心（註四）。但發生在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和經濟蕭條，使得中歐衰弱，而義大利所受的影響則較小，佛羅倫斯也趁勢逐漸取代了法蘭德斯的羊毛品地位，也因此才使得義大利地區得以依著地中海的優勢，在經濟上扮演了十四、十五世紀時最主要的角色。

威尼斯著其先鞭，凸顯了這一種情況。這個城市係處在亞德里亞海的末端，這地點位於西歐大陸和東羅馬帝國的交界線上。又因為它位在一個弧型海島中，和歐陸有兩哩半淺海之隔，所以受大陸的影響小。威尼斯興起於十四世紀初，而於十五、十六世紀之交走下坡。迄十五世紀止，威尼斯沒有開拓自己的農業基礎，它的糧食來自義大利南部、西西里島，甚至遠至小亞細亞和黑海之濱農業的提供。由於所處環境特殊，它寧可從事糧食的轉運，卻無意自己經營農業，所以後來這個城市政府雖佔領在大陸的領土，但是卻不受大陸農業社會的影響。威尼斯以造船業為主，十字軍東征使這一城市的商業性格徹底展現。通常威尼斯在大陸用兵係以僱傭軍隊為之，佔領了城市之後，就讓這些城市市民自組公社式的政府。但是若與海外殖民地與商業攸關者，就獨力經營，不遺餘力，比如克里特 (Crete) 島為威尼斯參加十字軍東征的戰利品之一，威尼斯人就在此經營了幾世紀。

這個島的人口從十四世紀以降到現代，總維持在十萬之譜，社會階級也並非僵固的，有時平民亦能以戰功而躍陞為貴族。另一方面，這個島的商業氣息與習慣，使得天主教會無法肆無忌憚地對他們約束或課以高利貸。可見此時的歐洲，一個經濟力能夠與政治權威頡頏的地區，大概屬威尼斯為首了。

威尼斯的主要工業限於造船業、食鹽的煎曬和玻璃工業。而匠工寡婦，祇要稍有積蓄，可以股份方式投資貿易，海員也可以附帶經商。城市中各種手工業，可以組織工會，但是海員卻不許有這樣的組織，而且海軍的兵員徵集自全市市民。在它最強盛的時期，所有的水手，都是自由公民，可以看出這個自由城市舉國皆兵的型態。而且威尼斯最重要的商業又是國營，商船又經常組成護航隊，所以商業艦隊與海軍的關係，極為密切。這個和後來興起的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倫敦的情形是同樣的。

針對這樣一個以貿易經濟利益為主的城市國家，它的法律及政治制度也必然是與之相配合的。有一個學者叫做錢尼 (Edward P. Cheyney) 就比較過火地說，歷史上的威尼斯是「它的政府即是一個股份公司。它的統領就是它的總經理。它的參議院，就是它的董事會。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票所有人。」這種獨特的性格顯然與純以政治權力為主導的政體是不相容的。也就是說，當時的威尼斯不可能在一種依附於農業的封建體制下而有當時的經濟成

就。因此，在當時的歐洲來說，這是一種異例（註五）。

以歐洲的內陸而言，城市作為一個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源之下，以商業為主的市民是一步步地改變了整個歐洲的封建體制，甚至於在最後訴諸各種手段以爭取他們的權力和地位。例如一六八八年的英國光榮革命以及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都是最顯明的例子。相反地，威尼斯從不需經過這樣漫長的階段與過程，它打從一開始發展，就根植了這樣的商業精神，一種早期的資本主義精神。這自然與它的地理環境有著絕對的關係。

這種商業角色，雖然在義大利的諸城市也都同時扮演著，但是卻也無法像威尼斯的商業精神那樣清晰而特出，以最負名氣的佛羅倫斯為例，它上自珠寶商，下至屠夫早有行會存在。其洋貨及布緞商皆有分銷處設於小亞細亞一帶，往北亦常在香檳（Champagne）等地市集，採購英法及法蘭德斯之羊毛品加工出售。雇員極多，匯票通行，銀行制度已具。銀行除了辦理存放款、貼現、兌換、旅行支票、匯款、水險等業務外，尚代理教皇收取賦稅，及為教皇墊支款項，不止如此，納布勒斯王國（Kingdom of Naples）等也常向他們告貸，故銀行在政經利益上享有種種特權。但世事常非絕對，有一利必有一弊，由於牽涉了歐陸上政爭的種種，佛羅倫斯的商業文化就和封建帝國的政治文化交糅混雜，不能像威尼斯那樣的獨樹一幟（註六）。所以從此一簡略的比較看來，威尼斯能成為歐洲近世國際經濟的第一個核心城市絕非偶然。另一方面，它在十六世紀的衰弱，則與整個歐洲大環境有關，因為隨著葡萄牙人

的持續海外拓殖，吸引了整個歐洲商人的目光。整體來看，十六世紀後，整個歐洲的經濟重心已不再是地中海，而是大西洋了。從非洲運回的香料、奴隸等貨物，需要良好的市場與集散地。因此地處低地國家的安特衛普的興起和威尼斯的衰落就成了十分明顯的對比。除了這個重要因素之外，威尼斯在十五世紀末地中海東部的貿易迭遭土耳其人干擾也是原因。就威尼斯而言，海島上地小，生產不足，國勢自然不能久遠。無論如何威尼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初期已完成了作為一個啟動者的角色，時間係十四、十五世紀兩百年中。當然義大利諸自由城市也同時做出了貢獻。至於後起之秀——中歐尼德蘭地區，在十六世紀中能夠帶領全歐經濟之風騷，也都是由於一些核心的城市，如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等。由此足見，自由城市在資本主義早期的角色是十分關鍵的，值得我們進一步去認識它。

三、城市的復興

當然，在威尼斯風光的歲月中，歐洲內陸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無法像威尼斯那樣的發展。至少在黑死病肆虐（Black Death, 1348—1352）之前，封建體制大體上仍維持著穩定，但是商業氣氛的增長卻也是無法阻擋的趨勢。當然，封建體制的瓦解和商業城市的發展都是在長時期中逐步逐步地體現的。

遠在十一世紀之後，亦即商業復興初期，游離的商人為了避免種種干擾和掠奪，就要求諸侯所屬的城堡給予保障，所以初期來說，商業的復興、城市的地位加重，基本上仍是以封建體制中的城堡為重心的。中世紀中，這些城市如何從以政治中心逐漸轉變為以商業、工業為主的重心才是我們應該注意的重點。因為這一轉折至少在朝代中國的城市中就沒有這種情形。

原先，在舊日的城堡中也存在著一些工匠與商人，但是這些人在中古世紀中究竟還不是主角，城市的發展，是依照著游離商人的需要，以原先莊園城堡為中心而向外拓建的。有一段時期，外圍城市仍以城堡為中心，但是逐漸地，新建城市部分內的商人團體，就開始主動組織種種團體，和領主的勢力發生對抗，實際上，他們的生活也與城堡中心人物完全不同。兩種文化在同一個屋簷中存在著，一方面，商人覺得處處受到諸侯領主的束縛，但卻又需要後者的保護；領主則覺得商人是其城堡經濟利益的來源，可增益其軍事和日用開支的需要，故亟欲加強控制。在這種矛盾下，鬥爭及妥協的種種互動很自然就會產生了。

莊園領主和諸侯都盼望從這些城市收到更多的地租、市場稅和法律費用，因此城市從政治性轉為商業性的特質，似乎是領主將土地讓步為市場的結果。商人則要求莊園及政治權力中心給予種種特權，到了後來，有些諸侯為了增加收益，更會建立買賣者所集合的都市和市場，以招徠更多的商人。在這一過程中，商業的重要性逐漸鬆動了原先對領主或諸侯的依賴和來自領主諸侯的束縛。其後，有些城市漸漸取得獨立和自主的地位，封建領主除了收地租和維持部分的法律外，其它的事則一概不能干涉。

自從十二世紀中葉，城市在歐洲各處個別出現後，到了十三世紀，城市已普遍存在。城市不但是貨品交易的中心，另一方面，它又成為生產貨品與思想的中心，它強烈的吸引著農村，包括農村人口移入城市之中找尋工作。流入城市的農民，一方面束縛於受雇的得勢商人，另一方面卻又獲得法律上的自由身分。德國諺語「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是相對於封建制度的身分約束。尤有進者，城市的自由空氣又給周圍農村帶來了自由。很多城市強迫封建領主解放農奴，在十三世紀的義大利尤其普遍（註七）。城市成為一個文明的新典範。總體而言，這個時期，西方城市具有幾個特性。第一，它是一個防衛體系；第二，它是一個市場；第三，擁有自己的法律（至少有一部分是自主的法律）的法庭；第四，具有一種結社性的特質；第五，具有中產階級的特性。亦即在國王、貴族、領主、農民、工匠之外的一種新階級（註八）。這種中產階級可以說是近代文明發展的承襲者。在政經實力上，他們逐步地爭取到種種行政權、司法權和財政權，另一方面，他們也為近代西方民主與自由的拓展奠定了基礎。

但是，我們要問西方城市這樣的發展，是不是就是資本主義呢？這是一個不好回答的問題。德國學者韋伯（Max Weber）就曾說，冒險進取、唯利是圖的精神並不是現代資本主義

的精神，因為這種心理，遠古人類即有之，中國也並不缺乏，韋伯說我們認為的「現代」的資本主義是有其特殊意義的。它必須具有一些合於經濟理性的特殊內涵，包括企業的經營、記帳、技術、法律、精神層次、倫理道德等各方面都必要符合此一理性才能算數，十二、十三世紀的城市是不夠資格說已存在合理的資本主義，但是一些有助於現代資本主義的因素卻在這些城市逐漸的成長。

首先，上述所謂中產階級（市民階級）與古代都市市民的最大差異在於前者的職業組織聯合，它的原因是，城市中，階級差別消失，他們來自四方，故亦祇隸屬於特殊法律之下，形成一個法律上自主的身分團體，這種以工作職業相似而聯合的基礎和特性，大不同於古代城市中以血緣的聯合。這樣不靠傳統的安排、不受身分或地位束縛的新組合，事實上已儼然成了一個身分特殊的階級。而城市作為一個聚合體，在十三至十六世紀間，與專制政體不斷地頹頹中（專制政體想摧毀的是城市的自主性而非城市）具有了某些法人的特權，這以個體為主，以法律契約為準的特色，為後世民主之基石，馴至最後，市民階級隨著近代國家的演進，而轉變成國家公民的觀念（註九）。另一方面，這些城市原本就為經濟目的而設，所以他們在經濟上的一些活動，都必然遵循合理的經濟法則，這便成了一種特殊的生活態度與文化。雖不能說他們皆唯利是圖，但他們確實也不可能全為某一種關係特質，如效忠或道義而棄經濟法則於不顧，若果如此，資本主義中的利潤觀將無從建立成為一種文化特質的。在政

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具有某些共通的特質，這些特質且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所以韋伯認為，我們不可僅以利得的動機去探討資本主義的興起問題，尚須從多角度去看它，至少從合理的經濟理性而言，它的萌發與持續，皆須多重的因素相互配合，而在某一特定的時空之中逐漸成型。中古城市的復興及特質，很顯然地，提供了這一契機。

至於另一位當代的法國史學家布勞岱（F. Braudel）則見解略有不同。他是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看資本主義的萌芽問題。在他看來，市場經濟在人類生活中早即有之，如小市場、商店、販夫、市集、交易所等。在以城市為中心的交易往來中，一方面人類世界的供給與需求強化了市場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市場的運作更促進了這種供需的幅度，最後，市場的發展漸將世界變成一個經濟統一體。市場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但市場經濟還不能說就是資本主義。他認為在市場經濟的頂層還有一種「不透明」的而且在操控市場經濟的活動，那才是研究資本主義的所在（註十）。

基本上，一般的市場經濟是常態的、有規則的或者是透明的，比如說市場中市民的需求、商品的價格或商人販賣的時間、地點；商店則在固定之所從事交易；市集的週期集會等等。但是當整體的貿易走向國際化，也就是走向長程的貿易時，不透明性便逐漸出現了。不止是產品的項目眾多，價格亦難測定，同時隨著時間的拉長，相對的金融、保險、資訊和交通的種種配合也跟著複雜了起來。它的情形絕不是小區域性的交易行為所能比擬的。在布勞岱看

來，「資本」可說是在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中所逐漸成型的新觀念，用以指出資本投資以再創資金財貨的情況，所以「資本主義」應該用為指依照資本形成時的報酬率高低，而擇取高利潤領域投資的情況。他認為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在中世紀就已存在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可以說是市場經濟範圍的擴大，是長時期的西方人類物質生活及市場經濟影響下的結果。在他認為中世紀後的市場經濟中，總有一些「有辦法」的人（可能是貴族或商人）在進行著這種不透明、違反成例（如場外交易），以便牟取大量利潤的活動，不管是農業、工業或運輸各方面，他們處在市場經濟的頂端，伺機介入掌握。中世紀地中海城市復興之後，長程貿易便是他們大顯身手之處，這些活動祇有少數人有能力進行，所以資本主義本身就是有著一種不平等的現象存在著。長程貿易，確實拉長了生產與消費的距離與時間，所以非得有充足資本、靈通的訊息、有力的關係、良好的信用等條件不足以為功。所以在往後的發展中，資本主義有著一些變化產生，第一，由於它的壟斷性質，必然也會引起他們之間的競爭，所以國家的介入是必然的事。國家可以保護他們，但同時也要抽取稅收，有許多國家的官員就同時是這類資本家的身分。舉例言，十八世紀英國的倫敦的官員就兼營海外貿易之業。第二，在長程貿易中要獲取暴利，必然要有著一片「等待開發」的土地，讓他們盡力享用，所以近代第三世界國家就倒楣了。

在這樣的發展中，範圍擴及了全世界，但這種發展顯然也是由一個具有資本主義式的城市帶頭的，各個城市依序次第執領導地位。城市作為一個核心，中層則有相當程度發展的區域和較小型的城市配合，最後廣大的邊陲地區則墊底，構成一種層級式的分工和不平等的供需關係。從歷史上看，這些核心城市依序為：熱內亞（Genoa）（一三八二年前）、威尼斯（一三八二～一五〇〇年）、安特衛普（一五〇〇～一五六〇年）、熱內亞（一五六〇～一六〇〇年）、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一六〇〇～十八世紀後期）、倫敦（十八世紀後期～一九二九）、紐約（一九二九）（註十一）。

我們探討中古城市的課題卻提到了現代，目的祇在說明凡事皆有一延續性和道理，作為一個學者，其工作就在把這些道理找出來。為了不使主題偏離，我們現在再把時間拉回十二、十三世紀中的歐洲吧！

在十三世紀的歐洲，隱然已出現了國際性的貿易系統與工業區，比如義大利北部和比利時西北部市鎮密佈，工業繁榮，代表了當時歐洲最先進的地區。中古工業的主要產品布匹是統治階級的奢侈消費品，此時紡織工業則生產名貴的羊毛衣，重質不重量，城市工業與農村經濟之間，仍有顯著的差異存在著，這樣形式的經濟發展到了一二五〇年達到了巔峰。其中雖然商業活動已有國際性的態勢和遠程貿易，但實際說來仍不廣泛，其內容尚以奢侈品為大宗，當時奢侈品的銷路非常有限，大都限於封建貴族的消費。而大多數的貿易形式反而是以地區性市場為主，內容則多局限於日用品方面的小型貿易上。在這時期中，封建制度在貿易

興起中逐步地演變與式微，但看起來是逐漸開展的商業經濟，大約在十四世紀前後卻發生了停頓的危機。這是為什麼呢？

四、危機的發生與解決

隨著當時歐洲人口的增加，土地資源的分割日甚一日，同時開墾荒田的運動也已經達到極限，十四世紀後整個歐洲的日常生活水準已是逐漸地下降了。由於生活水準的下降，又間接導致鼠疫的傳染，也就是黑死病的肆虐，歐洲人口據保守估計在幾年內死了三分之一以上。面對人口的急遽銳減、怠工心理日增以及農奴大批暴動或外移逃向城市之際，封建莊園中的地主只好以各種利益誘使農奴不要再逃亡，譬如把農地租給農民自耕，或允許農民將收成物拿到市場去賣，地主則同時收取租金。這種局面，事實上已更進一步消蝕了封建制度的基礎。

不止這樣，十四世紀中，整個歐洲的工公貴族為了奢侈的消費和戰爭費用的支出，往往是以加重賦稅來因應。以當時農業生產技術的水準要應付不斷加重的苛稅，其結果是使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我們看看當時，從一三三七到一四五三年的英法百年戰爭，這場長期戰爭使得整個歐洲的重要地區陷入了戰火的荼毒。這樣的時代，受害最深的就是農奴和低收入的人平民，因此這自然又連鎖式地引發了一連串的農民暴動。所至之處，舉凡貴族堡壘、鄉紳別墅，便免不了被焚燒劫掠的命運。

最後尚須一提的是一種生態性的危機，由於封建制度的耕作原以二輪制為主，土地在使耕一年後必須休耕，但土壤品質由於日後不斷地施作自然日趨貧瘠。根據氣候史學家烏特史壯(Gustaf Uterstrom)的研究，在十四世紀以及十五世紀初期，歐洲的冬季酷寒，這種氣候的變遷雪上加霜，對原本就已經相當脆弱的人口結構又造成了致命的打擊（註十二）。

以上的原因，使得十二、十三世紀以來略顯起色的歐洲經濟，很快地就又瀕臨瓦解的邊緣了。

危機，可能是表示一種舊有狀態的結束，一方面也可能表示了一種新局面的開始。從我們當代的眼光來看，十四世紀的歐洲經濟已經衰退到一個相當嚴重的地步，但是又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它不至於更加惡化下去？上述的這些困局實際上並不特殊，在全球其它地區、其它時期亦曾有過類似的情況。為什麼西歐在後來幾個世紀中有了新的轉機，不但擺脫了重重的困難，而且一躍為世界經濟的核心呢？

從整個歐洲來看，他們解決的方式是很特別的。從對外的方式來看，他們採取的是海外的擴張；對內而言，就是歐洲內部自然產生了新的生產方式——大範圍的分工性地理擴張，這也就是說歐洲各個地區以最低的成本和最佳的條件生產最適合的產品，並透過市場以互通有無，這種生產方式自然比起以前那種自給自足的方式或者是小規模的交易與生產更進步更

有效率了。這種分工的情況後來更擴遍整個歐洲世界內部，使得整個歐洲成了一個國際市場。不止如此，這種生產方式在十九世紀還擴及到全球，至今不衰。底下我們將分別說明。

首先，就世界體系理論的觀點看來，這個危機（或轉機）的主要時期從一四五〇年起至一六四〇年間，就其整體的特殊同質性，這個時期也可稱之為「漫長的十六世紀」。這個時期，歐洲內部進行調整適應，逐漸加深了各地的經濟互賴，是歐洲世界的經濟成型的初期階段。我們一般所謂的歐洲資本主義正是孕育於這一時期。

我們先來看看他們用的是什麼辦法解決問題。第一先介紹海外的擴張。由於歐洲本部的生產技術一仍舊章，封建體制雖被商賈及自然災害拖得奄奄一息，但還未能夠逼出新的政治制度以配合解決經濟方面的危機。這其中葡萄牙是首先從事海外開拓的，由於陸道為西班牙所阻，葡萄牙向唯一的自由邊境——大西洋尋找出路似乎是唯一的選擇。非洲係因此由葡萄牙所發現，一四八七年繞至非洲好望角，隨著航線的拓展，葡萄牙的艦隊也相對增強。葡萄牙原先往外發展的動力乃是生活上所迫切需要的食物、燃料及衣物原料，慢慢加上尋找金銀等貴重金屬和香料等。葡萄牙和西班牙比較起來，葡萄牙所接觸的地區大部分都是較文明、較富庶而且是集中於大城市的民族。所以除了在巴西以外，它的殖民制度和西班牙都很不相同。比如說，它都是佔領易於防守的山岬、島嶼及沿其可以立足的國家海岸設立工廠和砲壘。而各工廠和砲壘地又相隔甚遠。其所最注意者主要是擴展市場，以歐洲貨物交換附近居民之

東方物產。這種發展正是代表了對歐洲內部危機的一種突破方式，而隨著新航路、新大陸的發現，不但促成大量金屬的流入，也促成了歐洲各國相繼致力於海上的拓展與開發。

當然，葡萄牙是小國，日後對其所佔領地，常無力派遣足夠的軍隊與行政人員戍守管理。然而在歐洲海外拓展初期（十五、十六世紀間），其他國家，除了西班牙之外，尚未開始注意及此，故葡萄牙之國力亦曾顯赫一時，當時甚至有「偉大的里斯本（葡首都）」取代威尼斯的讚詞。葡萄牙的率先動作，不但給自己帶來了繁榮、財富與驕傲，同時也改變了歐洲的命運、改變了世界的命運（註十三）。

除了上述的海外擴張之外，歐洲解決自己內部的經濟問題，就是用一種經濟分工的方式。我們都知道，在今天如果一個人或一個地區要生產自己所需要的全部用品，自是十分沒有效率的。如果各個地方能夠運用他本身的資源和條件生產符合經濟成本的物品，再透過貿易的方式交換物品，那麼就經濟效率來看，這才是合理的。但是如同前面我們曾提到的，這種貿易交換的自由市場觀念，事實上並非完美。往往在交易過程中，有些不合理的方法和手段出現，比較弱勢的群體和國家則常常吃虧。比較來看，當時全世界科技工業最進步的地區是西歐，比較差的就是東歐、中南美洲、非洲與亞洲。以葡萄牙為首的西歐國家，當他們在與其他地區作貿易往來時，常常是挾帶著軍事武力為後盾，同時由於他們擁有雄厚的資本和技術，相對而言，落後國家所能提供的僅是人力和原料糧食。很明顯，由於後者常要以很大的

數量才能換取前者少部分的產品，所以就長期來看，這種交換貿易型態就會有不合理的情況產生，簡單來說，就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不平等發展，西方國家藉著擴張而攫獲更多的資源和人力，不但突破了原有的困境，並且能持續的加速發展；非西方地區則在這種不平等的交換狀態下，拚命地提供人力和原料，經濟狀況始終維持在一個相當初級的水平。

就經濟分工而言，上述的是就歐洲與非歐洲地區的情況而說的，但是隨著地理上、經濟上的擴充，歐洲內部也逐漸發生了經濟分工的狀況，這種分工的狀況也造成地主與農人之間不同的關係。

遠在歐洲中古時期的封建莊園經濟中，原來的農業生產主要是以農奴的方式進行的，但是由於商業貿易型態的快速推展、海外擴張、天災與人口等因素，使得莊園經濟的農奴制度幾乎維持不下去了。最重要的新型態就是所謂自由勞動 (free labour) 的出現，這種自由勞動，換句話說，就是勞動者他本身不再是附屬於某一王公諸侯的財產，他開始以自由之身透過與雇主訂契約或領取工資的方式來出賣勞力。當時傳統的生產勞動不會一下子完全消逝無蹤，但是這種自由勞動方式卻日漸普遍，此外還產生了自己耕作的白耕農，或靠技術為上的小工匠 (artisan)。這種勞動方式都在「漫長的十六世紀」中逐步發展，到了十七、十八世紀就顯得更為顯著。所以歐洲新興的中產階級或布爾喬亞階級 (bourgeoisie)，其主要成員，便是來自這些人。我們要深記，如英國、法國的近代民主革命，就是主要透過這些人的

團結而造成的，在他們的努力之下，傳統的國王、貴族都逐漸被推到政治權力的外圍去了。一般而言，西歐在十六世紀以後，農奴制度可說已經消逝了。西歐無論是在農業商業化、專業化和工業成長都比歐洲其它地區高，由於農業生產程度高，所以資本家用薪資來雇請工人遠比養一個農奴要來得有經濟效益。當然過去諸侯養農奴不止是純經濟的考慮而已，尚有軍事的意思。相形之下，東歐在整個歐洲大危機之中，並未能產生類如西歐一樣的自由勞動工作形式，而仍舊回復到了原先的農奴生產方式，東歐農人在十六世紀仍根植於土地，勞力和報酬都被地主強迫侵占。為什麼呢？因為東西歐之間的經濟分工。在經濟分工中，東歐地區的生產由於不如西歐的先進，所以祇能出口初級品（包括穀類），並透過波羅的海和西歐貿易，因為祇能維持單元化的生產，同時又在勞動力缺乏、土地過剩之下，地主為了增加生產就必須控制農民或採取奴隸方式以榨取大量的利潤。所以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握有資本和技術優勢的國家憑著上述的基礎累積他們在其他地區所獲得的資源，逐步走向農、工、商並進的多元發展。落後地區由於無法與之抗衡，其勞動問的關係也顯得不文明（註十四）。總體說來，不止東歐如此，其它如與西歐接觸的地區如中南美、非洲或亞洲地區，勞力密集或勞力剝削的生產方式也就普遍存在著。這些地區，主要產品是麥子、糖與棉花等原料，這些所需要的的是大量的勞力，而不是技術。

在此附帶一提的是，相對於東歐與西歐的技術，南歐（地中海地區）算是處在二者之間，

地中海沿岸生產高成本的工業產品如絲、綢。這個區域的農業生產就採取了介乎東、西歐之間的模式——租佃合耕制 (sharecropping)。這三個區域藉著國際市場交換日用品，而這樣不同科技內容的交換也決定了每個地區的勞動力關係。這樣的關係和國際分工在一六四〇年後逐漸地固定下來。西歐透過了海外擴充和與東歐的接觸，加速拉大了領先的差距，而原先奄奄一息的莊園經濟，終至一去不返了。

從這樣的發展來看，地理上的擴充將非西方的世界納入到以西歐為主體的市場貿易中；另外又藉著分工生產的方式加強了彼此間相互依存的網路，這也就是歐洲世界經濟體系的形成過程，亦是西方現代資本主義興起的歷史面貌。

附註

- (一)張維安，「韋伯論西方中古封建體制與資本主義的萌芽」，載於陳介玄等著，韋伯論西方社會的合理化，台北巨流，民國78年一版，頁七三。
- (二)黃仁宇，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台北聯經，民國80年，頁五二—五七，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二冊（歷史學），台北商務，民國68年五版，頁三四一—三四二。

- (三)陳其鹿，資本主義發展史，台北帕米爾，民國65年初版，頁十四。
- (四)陸光恆，世界體系與資本主義，台北巨流，民國77年一版，頁一三七—一三八。
- (五)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台北允晨，民國78年四版，頁一〇九—一一六。
- (六)同註二，頁十一—十二。
- (七)夏伯嘉譯，契波拉編，歐洲經濟史（中古篇），台北新橋譯叢，民國73年，頁七七。
- (八)同註一，頁七六。
- (九)翟本瑞，「西方市民階級的源起及其意義」，載於陳介玄等著，同註一，頁五八—六六。
- (十)同註四，頁二一七—二二四。
- (十一)F. Braudel, *After 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 Press, 1977, pp.79-116.
- (十二)高承恕，理性化與資本主義——韋伯與韋伯之外，台北聯經，民國77年初版，頁七二。
- (十三)宋衡之譯，G·累那爾等著，現代歐洲社會經濟史，台北商務，民國60年台一版，頁一八一—二〇〇。

(十四)I.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 Century*, N.Y.: Academic Press, 1974, pp.99-103.

第二章 從農業的到工業的資本主義

一、資本主義式的農業

我們現在再回頭檢視一下歐洲十五、十六世紀的發展中，有關農業生產的情形。因為在那時期農業的生產畢竟尚是一個重點，這個道理就像現代許多開發中國家，農業問題仍舊是它們發展的一個起始點一樣。我們從農業的變遷中將可發現很多寶貴的理解。

我們先舉一個重要的觀念來說，那就是農業資本化、商品化的問題。原先西歐的農地在封建制度下自然是王公諸侯們的采邑，也自然沒有買賣的問題。但是自從大危機發生後，情況就發生轉變了，從十五世紀以來，歐洲農業由於諸侯們為了求生存不得不一改過去的農奴生產方式，而開始將農地或農產品看待成一種商品而加以買賣。由於他們把農地看成一種商品，於是就發生了許多在那時看來是相當特殊的變化。

這些變化包括幾大類，第一就是折現，第二是直轄地的出租及租地農的成立，以及第三的圈地運動（註一）。

折現 (commutation) 是上面所說的自由勞動 (或工資勞動) 的一種表現。在傳統封建莊園經濟中由佃農或農奴負擔徭役以耕作領主直轄地的作法，逐漸地改變成由農人向領主繳納現金地租。這種用現金繳地租易成耕作生活的出現，就是折現的意義。這種轉變意味著中古莊園經濟的瓦解，同時也顯示了貨幣經濟的發展。用貨幣的流通以交換各種資源和勞動力，的行為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我們想想如果沒有貨幣的大量使用，遠程的貿易和交換物品的繁複性將會大大的受到限制。對於折現情形的出現，過去一般的解釋是認為工商業發達的自然結果，所以折現出現最早的區域，也就是工商業和城市發達的地區，比如像英國、荷蘭地區 (尼德蘭) 等。當然由於黑死病，造成人口銳減，也間接促進了農民勞動力的重要性。但是這種農業生產商業化、資本化的趨勢——折現，如果沒有外在條件的配合，它出現的可能性就要大打折扣。所謂的外在條件，係指西歐在近代的往外擴張中，由於對外貿易的強勢和科技的優勢，其利得更刺激了歐洲內部這種折現現象的發展。因為相對來看，東歐地區就不會有顯著的資本化農業出現，當地仍舊維持傳統的農奴制度。

在十四、十五世紀中，莊園經濟另一個走向資本化的趨勢是，領主將其直轄地連同所附帶的徭役或貢租一併出租，以解決他們在經濟上的窘境。這種發展的出現，主要是因為折現的影響和工資上漲的關係，這兩個因素，造成領主在直轄地上的耕作利益一年不如一年，因此如何在比較高的工資水平下仍有利可圖，這便需要作商業化和資本化的考慮了。這種情形的演變當然也是受到南北歐商業文化氣息長期的薰染所致。傳統終於在整個歐洲面臨 (十四、十五世紀) 的經濟和生態危機逐漸地瓦解了。

最後一種比較不人道的變化就是十五世紀中葉以後，圈地運動的發展。所謂圈地就是領主及王公貴族為了商業利益強迫兼併農民土地。主要發生在英國，有兩次主要時期：一是在一四七〇年至一五三〇年，第二次是在一七六〇年至一八三〇年。此處所要說的是第一次。由於當時國際市場羊毛的需求量非常大，羊毛價格高漲，領主為擴大羊毛大規模的生產，就將耕地變為牧場並將與農人共同使用地，重加圍牆，侵害農人的共同使用權。農民因此從農村被放逐出來而湧向都市。據估計，因為牧羊而擴大耕地的結果，有三十萬人失業，有四、五百個村落斷絕人煙。這種圈地行為，甚至連教會地產上的世襲佃農也同樣遭殃。此淒慘景象，托瑪斯·莫爾 (Sir Thomas More, 1478-1535) 在「烏托邦」(Utopia, 1516) 一書中，曾喻之為「羊吃人」。就圈地運動看來，莊園經濟逐漸地走向一種新的經濟生產，而不再固守以前大致是自給自足的型態，因此土地的利用顯著地出現了專業分化的現象。由於國際市場的需求，西北歐地區改變了其土地的使用方向，它不再一定以農業種植為主，畜牧業是其中的一個出路，而本地區所需要的糧食，則可由東歐及南歐地區來提供，其人力、物力則轉投於更能獲利的工商業。圈地運動的發生，表示了商業化的走向，這當中農民作了很大的犧牲。

農業商品化及圈地運動改變一些情況。例如採用科學方法、人造肥料的使用等等，這些

情況所需之資本和經營的手法不是傳統小農所能擔負的，除了這些因素外，對於法律的疑問、變動的市場價格和企業的投機亦皆非小農所長。由於不能維持獨立自主的地位，就不得不往城市中覓生路。城市的勞動力增加了，自然工錢就不會太高，廉價的勞動力自會進一步促進產業的發展。在漫長的十六世紀一中，西歐的農民為整個資本主義的初期發展付出了龐大的代價。

上述這種農業商品化的發展，事實上祇發生在西歐地區。這一階段，資本家求取利潤大抵是在商貿和農業方面的。雖然這時期工業革命尚未到誕生的時刻，但據布勞岱的見解，資本家在不透明的層次，將資本投注於農產品商業化，以獲取暴利的作為，已算得上是一種資本主義了。一般的工商業者則在城市中牟取市場經濟利益。這種種情形不斷地發展，促使了整個西歐社會發生了結構性的轉變。過去社會中的貴族、君主、領主、農民等階級身分，逐漸被代之以資本家、工商業者、勞工。新的經濟社會自然會形成了新的文化。西歐在漫長的十六世紀中，新的風貌逐漸成型；反觀東歐的發展，就沒有這樣的順利。前曾提及在一漫長的十六世紀「危機中，歐洲大陸以東歐、西歐間的分工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之一。所以東歐即一直停留在貴族統治農民的狀況中。所以十九、廿世紀之後，共產主義能在東歐地區發展是有這種歷史因素的。因為共產主義，最容易在經濟落後、階級壓迫明顯的地區滋生，我們如果把全歐洲放在比較長時期、大範圍的角度觀察，東西歐的差異就比較可以理解了。

二、資本主義的轉型與核心地區的改變

照理來說，西歐在農業生產的分工以及海外的擴張中應該將這一優勢一直保持下去才對。但事實上卻並不那麼容易。因為所謂當時的西歐事實上已有許多現代國家的形式存在。從東羅馬帝國滅亡（1453）後，整個歐洲已逐漸有了現代版圖的雛型。國與國之間，諸侯與諸侯之間合縱連橫都希望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因此在西歐這一個大區域內，各國不斷地在諸如海外擴張、貿易與國內生產上去厚植國力。海外擴張也是國力的展現，各國除競相從事之外，貿易的利得更是不可能使各國僅滿足於農產品加工等次級項目的輸出，工業的產品量亦必隨之而增。西歐各國於是展開了這場永不止息的競爭。

首先我們再接著談海外擴張及其發展。初期（十五世紀）的海外開拓係由葡萄牙人居先，繼之者有西班牙。結果使歐人對南北美洲、非洲及東印度群島之知識大為增進，探險乃開闢殖民地之先聲。

西葡兩國後因地盤爭執，遂由親西班牙的教皇亞歷山大六世調處，終於在一四九四年訂定條約，規定：以綠島群島（Cape Verde Islands）（大西洋中約距西非沿岸三百哩處）以西二七〇里格（每league約當二哩）子午線為分界線，此線以東歸葡，以西歸西班牙，瓜分

了所有新發現的領土。

西班牙在十六世紀後逐漸超越葡萄牙，成為歐洲第一強國。一五〇〇年九月，西王頒佈御詔，禁止西國人民及駐西各國人民用外國船隻運貨，以保護本國船隻及業主，同時維持有一千多艘的常勝艦隊。幾乎是在十六世紀的百年中，西班牙靠著與各國通商及美洲的開拓維持其霸業而不墜。

十六世紀間的物價革命 (the price revolution) 係指新世界發現後，從美洲所掠奪的貴重金屬如金、銀大量流入歐洲引起物價大幅上升的現象，這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通貨膨脹。影響深遠，大致言之，一五五〇至一六〇〇年間歐洲物價約增加一倍，至一六五〇年左右則已為一五〇〇年時之三倍。此外，物價上漲現象並非完全由於貴重金屬之流入歐洲，例如一四五〇年以後人口的增加、非農業生產人口比例日增、農業技術並無突破性的改良等皆是原因 (註二)。影響所及約在數個方面：第一，各國政府稅收常感不足，於是有的向私人銀行家借貸，有的以新幣增大幣值或侵奪等方式來因應。第二，使靠固定收入為生者蒙受不利，如西歐之土地貴族和工資工人 (東西歐土地貴族境遇大為不同，西歐土地貴族所收之地租在幾世紀前已折換成固定款額，即折現，所以收入愈來愈差，東歐則農民未脫農奴地位，地主因穀價上揚而坐收其利。) 第三，這當中只有工商資本家獲得好處，他們因物價上升，市場擴大和新貨品 (茶、煙草等) 的流行大賺錢 (註三)。同時，在物價革命之中，美洲大陸也

納入了歐洲世界經濟中，成為邊陲地區，由美洲輸入的金銀鞏固了此體系的財政基礎，其中尤以白銀之大量輸入將歐洲之貨幣制度由金本位制轉變成銀本位制；因此，白銀之輸入成為歐洲之經濟基礎，同時也造成了體系內各國地位的轉換。在十七世紀前，西、葡二國反因輸入過多的白銀，使得工資與物價同時上昇而相對地維持平穩，資本家之利潤有限。而英、法兩國則因工資落於物價之後，勞工生活水準遽降，工人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動才能圖溫飽，而資本家則因之而獲取更多的利潤 (產品價格上漲、工資維持不變的關係)。此種代價是後來英、法成為工業資本主義重要原因之一 (註四)。所以我們要知道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勞工常常是較吃虧的。

西、葡其後除了上述原因無法續其霸業外，更有其它因素促成。由於葡萄牙對屬地只知掠奪而未能妥善經營，造成當地無限紛擾與暴亂，東印度群島乃誘發了荷蘭之競爭。葡萄牙能夠獨佔屬地，係建於海權之基礎上，但由於其人口及富源甚少，不足以恃久遠，一五八〇年以後五十年間，葡萄牙為西班牙所管理。當時西班牙全神貫注於新大陸，而疏於遠東之經營。此路線香料輸入之專利遂落入荷蘭之手。十六世紀間西班牙自中、南美輸入大量白銀，大部分消耗在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國之戰爭軍費上。並且，前於一四九二年費德南王 (Ferdinand) 時更驅逐國內猶太人出境，致西班牙失去有經驗之金融家，且持續虐待莫爾人 (Moors)，使最重要之工農業階級遭逢致命傷。同時西班牙政府對於商人保護監督過於嚴

密繁瑣，貿易漸不敵英荷兩國商人之競爭。一五八八年常勝艦隊遭遇大敗，其殖民地與商業，一任英國劫奪，白銀輸入漸枯竭，並而導致其原轄地荷蘭的獨立。其核心地位在十六世紀末葉時已喪失了。

接下來，我們繼續談到政經核心的移轉。

在十五世紀中葉之前，地中海沿岸原是金融與工業重心，這在前章已提到過。如威尼斯、熱內亞、佛羅倫斯等地皆先後執市場經濟之領導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紀初則漸淪為半邊陲地區，亦即發展情形介於西歐與東歐之間。主因乃敗於北歐的競爭。以布業為例，因恃其傳統名氣，墨守陳規，專門生產奢侈昂貴之布料，由於地中海沿岸地區社會貧富懸殊，故本來就無法純依賴自己區域內消費市場而生存。在對西歐內陸的長程貿易（long-distance trade）上又被輕薄價廉之英國布取代。最後更連國內市場亦隨而喪失。同時他們的工匠憑藉行會（Guild，基爾特）的力量堅領高薪。工商業方面漸無利潤可得，資本遂大量移至農村，城市商人亦逐漸轉為貴族地主，（註五）這有些像台灣商人在景氣差的時期，將資本投注於土地保值與投機，而不再生產的情形一樣。十七世紀初，荷蘭之阿姆斯特丹遂取而代之，成為當時國際貿易中心。

當然在阿姆斯特丹之前，安特衛普（靠近阿姆斯特丹）亦曾執牛耳一段時期（一五〇〇—一五六〇年）。此肇因於當時美洲與南非好望角的發現，安特衛普就成了葡萄牙轉運其獨占物資包括黃金、黑奴與北歐交易之中介站（註六），因此而成了歐洲金融重心。同時又因尼德蘭佔中歐地利之便而成的工業發展，使得安特衛普具有了工業資本主義發展之雛形（註七）。阿姆斯特丹兼而據此地利，隨後在十七世紀初繼熱內亞而興起。

低地國家（即尼德蘭，範圍大約包括今之荷蘭、比利時、奧地利、盧森堡等）在中古時期原本是一政治體系，南部（今比利時）的經濟一直較為先進。自反抗西班牙暴政之獨立戰爭（一五六八—一六四八年）後，南北分裂，北方七省結盟立國，居民多為新教徒及民主黨，自由意識高，故自行爭得信仰和自治政府之自由，由荷蘭一省領導。南方（崇奉天主教）仍歸西班牙統治。獨立戰爭八十年間，北方新小國透過商船隊的力量，十餘年間便躍為核心地位。

荷蘭在中古後期（十二到十四世紀間）是落後地區，封建莊園制基礎因此本就不牢固，故日後之農業技術革命，並未遇上封建領主的阻礙。在農業革命過程中，傳統的農村社團解體，土地集中少數富農手中。農村剩餘人口則成為新資農工或流向城市港口。耕地集中又有足夠資本改良機具，農業生產遂突飛猛進。在大城市阿姆斯特丹的統治階層則組織合股公司、股票與金融市場，擁有銀行、商船隊。農業與城市供需配合，相互餵養而結成一體（註八），於是創造了其經濟霸權的時代。

十六世紀中，荷蘭人可說是全歐的貿易經理人，挪威、普魯士、愛爾蘭、英格蘭、日耳

曼，甚至於遠至塞浦路斯、印度、南美、中國、印尼的貨物皆承其運轉。一六〇二年，竟然不顧西王菲立二世阻止，在爪哇聯合當地人組織了大荷蘭東印度公司。公司的資本大部分則由荷蘭各城各省所認購。從這點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資本主義性質與原先的威尼斯是有些神似的。這一公司獨擁印度洋及太平洋的航權，並有征服該處各地之權利，荷蘭國會則跟著分食掠奪來的利益。西班牙不久被逐出此一勢力範圍之外，馬來西亞半島及諸島、錫蘭、好望角先後為其所佔，後又與中、日建立關係，取得台灣與廣州的租界。一六二一年又開辦了西印度公司，發展尤速。不數年間在智利海岸增設工廠，並於北美亦有立足點，在一六五〇年，荷蘭極盛時期，擁有船隻萬餘艘，航海人員十七萬之譜。

荷蘭在國內，資本其實多聚集於此小共和國之大商賈手中，同時其銀行組織完備，而國中的政治氣氛自由，故工業在此條件中繼商業而興，絲、帽、布、瓷器、印刷、鑽石、鏡片等工業應運而生。在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有工匠六十萬人，而阿姆斯特丹一城佔五萬四千人，製造業促成城市勃興，城市居民竟佔全人口的三分之二，這個比例正好說明了當時特殊繁榮的情形。

但是隨著農工業之發展，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或遠洋航行，勞動力漸供不應求，導致工資不斷提高，投資利潤逐漸低微。其結果使得技術工人他去，資本家亦漸放棄商業而純從事金融操作。因此十七世紀的荷蘭商業資本主義，比較當時英國而言，由於缺乏農業與製造業方面較堅實的根基，終無法發展成工業資本主義，而轉入金融資本發展之途（註九）。加上其天然富源不足，原料無所出，逐漸無法與工商並進之英國相抗衡。十七世紀中葉後荷蘭之霸權就逐漸衰微了。

三、工業資本主義

提及刺激英國工業革命的角色，其由於農業技術上的突破與土地所有制的改變所促成之農業資本的累積，實在比商業累積的資本來得重要，這可以看出它為何最後可以取代荷蘭的地位。溯自十五世紀末的英國圈地運動乃為了解除封建制度末期的危機，由於歐洲市場之羊毛輸出與織布業獲利可觀，貴族豪富遂透過王室之協助逐漸地吞併佃農、小型耕農之土地，組織大農場與牧地，小農漸而式微。其結果造成了機具的進步、產品多樣化與商業性質的農業。一七六〇年圈地運動因工業人口增加、食物（小麥）價格高漲時又復大盛，貴族地主因此累積了更多不道德的資本（註十）。與第一次圈地運動的手法比較起來，貴族地主不再以赤裸的權力為之，而是透過請願議會通過各個地域的法律，將其兼併和收買行為合法化，以達到大農制及資本主義農業經營方式的實現。

當時法國的農業與英國同樣地經過了封建末期的危機，但英法百年戰爭後（一四五

三），法國農村蕭條，法王室為鞏固皇權，遂支持農奴擺脫封建貴族地上的控制，以增中央賦稅，貴族因此無法恣意剝削。馴至十六世紀，農村因安定而人口驟增，農業上無法累積資本。而在十六世紀下半，法國又發生長期內戰，表面上是一種宗教性質，但在政治上的意義是封建貴族對抗（國）王權，當時法國地方勢力大，有三百個各具司法系統的地區。約有一半的貴族不僅要求宗教寬容，並主張定期召開三級會議以控制國家財政，為法王所不能忍，制裁遂起。法王路易十四（一六六一—一七一五年）時征戰連年，苛捐雜稅，貴族與農民率皆不得免，國力耗弱結果，造成政經統一之延後。反觀英國王室與貴族鉅紳之合作無間，除了促成資本之累積外，同時亦導致了現代國家的形成。可見當時王室、貴族與農民三角關係對日後各國的發展有多麼重要。而國家政治力量與資本家貿易密切整合成功的核心國家實以英國為首。

英國在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後，貴族、鄉紳在國會的力量，宣佈了專制王權的死亡，王室的權力緊縮。而國會中有大部分的議員也直接或間接經商，除了第二次圈地運動的法規促成外，他們也廢止了一些助長壟斷或妨礙自由競爭的法令。而上索本身為了國家及私人利益，也常協助或保護貿易商人的外貿利益。十七、十八世紀英國雖離現代民主政治尚遠，但是當時的貴族却是全歐中不排外的，同時也都逐漸轉變為經商致富的貴族，其自由風氣自然較歐陸開放，這種情形鼓舞了各國流亡者的趨附，工商業的發展自不待言。

這裡有必要說明一下，什麼叫做重商主義，這對我們了解十七世紀的資本主義有很大幫助。重商主義，其精神在將資本家之利益與國家之利益聯成一氣，最早實行者為西班牙，英國繼之，頗為成功。史學家韋伯嘗言：「重商政策之精髓，在於將資本制度下企業家之觀察點與政治之觀察點合而為一。換言之，即國家之施政的著眼點是把全國都看成是資本主義之企業家一樣，完全為彼等利害上著想。經濟政策之表現於外者，就是無往而不欲乘機在商場上戰勝敵人。進口貨價力求其低，出口貨價力求其高；因此而增加國力，使政府對外之地位，可以佔優勢。故重商政策之手段，即增加人民之納稅力，使國家發達，成一政治上之強國是也。」

重商主義盛行於十六、十七世紀兩百年間，它有幾個主要論點：第一是金銀通貨主義（bullionism）。亦即認為國內金銀愈多的話，愈表富強。第二是力主維持優惠的貿易平衡，因而鼓勵出口，獎勵工商。第三為採取保護關稅政策，以助國內工業成長，同時亦可使利潤和工資留置國內，以便課稅而裕國用。第四為主張發展殖民地，以供應原料和購買本國之工業成品。由上看來，國家發展與經濟擴張已密不可分。英國、西班牙、葡萄牙諸國屢頒航海法規（Navigation Acts），規定運自和運往各該國之貨物必須由自己國家船隻（或供應地區的船隻）裝運，都是此種政策理念下之產物。從外貿的觀點來看，十七、十八世紀英國對邊陲地區的經貿過程確實累積了大量的資本。

英國透過了如此政經整合的形式，配以其國內產業革命之發生（一七三三）（註十）
 二），使其迅速擊敗了諸國的競爭。資本主義原先祇在農業方面，後來含攝了金融部門，而繼商業與金融部門之後，又增加了工業部門，作為其成長之新動力，歐洲世界經濟體系益形鞏固。此處須附加說明者，乃並非所有的商業資本的累積皆能如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那樣，順利地進而資助工業的擴張，其尚得依靠有利的地理環境和社會文化等條件，後者諸如：傳統上受尊崇的工匠與技工已妥備成為未來之工業領導人和「新教工作倫理」的深入人心（有關這些配合因素，下文將有專章來討論它），如果缺少這些有利的「必要」條件，商業資本勢將造成奢靡生活而已，先例如西、葡兩國便是。而且在英國產業革命前，資本都僅停留在流通、貿易與市場等部門中，直到十九世紀以降，由於機器（如一七七六年蒸汽機的改良使用）將生產條件加以轉變後，工業始成為獲利的部門。

工業革命（或稱產業革命）在英國首先開展。它指的不僅是生產的機械化與動力化，而且同時也使得工廠制度、大量生產與分配、勞動人口以及精密的財政與商業組織次第出現。它奠定了近代西方文明的經濟生活基礎，從而並影響了世界的其它地區。英國的工業革命始於紡織業的機械化與動力化，從此造成相關產業的連鎖發展：煤鐵工業、蒸汽機、運輸工業、電報術。十九世紀下半期以後，工業革命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新工業的興起（鋼、電力、化學工業）以及工業國家的增多，同時各國國內過剩的資本也不再受政治疆域的困限而向外

尋覓投資的機會，有些人稱之為第二次工業革命（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細論之，工業革命以前的資本活動，多由土地貴族與上層中產階級所操控和經營，仍未擺脫傳統農業和過去商業的色彩。工業革命後就漸次改觀了。工業機械化以後，很多機器不是常人所能獨自擁有，並且也不再適宜家庭式的生產。終至資本、原料、機器、領工資的工人會合產生了工廠組織，所以股份公司也就應運而生，公司用發行債券或股票來籌集資本，以付息或分紅方式來分配公司利潤，並雇用經理人員來經營開拓，投資者也可經由銀行、信託公司或證券交易所來投資。近代型態的資本主義制度就此逐漸確立了。

總結來看，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實在是歷史上一種獨特的現象。在西方資本主義能夠發展之前，必須要區域性小規模市場經濟已充分發展，其間舉凡地理、人口、政治、農業、工業、商業諸要素均對市場經濟的擴充，依不同的時空，貢獻其功能，這才有可能促其誕生。從今日角度來回顧，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法國史學家布勞岱曾言：

「資本主義只在特定的社會中產生，其源遠流長，非平地而起，只待其他條件具備之後，在有利的環境中自然孕育而成（註十三）。」同時經由資本主義的發展性格，在長程貿易上擴大了經濟世界的領域，促進了國際性分工。尤當資本家與國家結合為一體時，其影響力更是無法估計的。

綜言之，英國的農、商、工業，在通過國家系統推動複雜廣泛的國內外市場後迅速發展，

並取得核心國之霸權地位。西歐其他國家，亦效法英國之榜樣，分別於十八、十九世紀，發展了自己的工業，且陸續地進入了工業資本主義歷史期。依序有：十九世紀中葉後的法國與比利時，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〇年後的德國，一八九〇年後的俄國、義大利和奧匈帝國，以及十九世紀中葉後的美國和日本。

緣自地理大發現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斷擴大，至十九世紀間已涵蓋全球。

附註

(一)高承恕，*理性化與資本主義——韋伯與韋伯之外*，台北聯經，民國77年初版，頁八〇—八三。

(二)R. R. Palmer,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N.Y. 1971, PP.120-121.

(三)William McNeill,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Handbook, Revised and Enlarged*, Chicago, 1969, PP.374-375.

(四)張漢裕，*西洋經濟史*，台北商務，民國58年，頁二一九—二二〇。

(五)夏博嘉，「資本主義與物質生活：歐洲經濟史研究的一個探討」載於夏伯嘉譯，C.M.Cipol-

la編，*歐洲經濟史*（中古篇），台北允晨，民國73年，頁二—三。

(六)F. Braudel,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 15th~18th Century*, N.Y. : Harper and Row, 1984, Vo. III, pp.138-142.

(七)F. Braudel, 1984, *ibid*, pp.154-156.

(八)夏博嘉，前引書，頁八—九。

(九)至阿姆斯特丹時期，歐洲經濟世界所展現的主要性格就是信用和金融事業的發達，而商業貿易逐漸退居其次。見F. Braudel, 1984, *op.cit*, Vo. III, pp.196-197.

(十)宋衡之譯，G. Renard & G. Weulersse著，*現代歐洲社會經濟史*，台北商務，民國60年，頁九三—一〇六頁。

(十一)轉引自陳其鹿著，「資本主義發展史」，載於帕米爾書店編，*資本主義*，台北帕米爾，民國65年，頁四五。

(十二)依布勞岱的見解，產業革命係包括一系列的變革，是農業、人口、運輸、技術採行、貿易、工業等各層面的發展所成的總效果。其發展早在進行中，工業化不過是其中的一環。同時誠如巴洛契 (P. Bairoch) 所言，產業革命最初十年，技術是由經濟所控制，技術創新是依賴市場狀況而生，而非因創新與技術促成經濟發展。見 F. Braudel, 1984, *op.cit*, p.557 & 567.

④ F. Braudel, 1984, ibid, p.600.

第四章 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資本」二字可能是非常具體而易於理解的。但是在西方歷史的發展中，「資本」卻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從歷史上來看，「資本」可以說是在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間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所發明的新觀念，用它來指明資金投資而能再創資金的情況。

而資本主義應該可以泛指依著資本形成時報酬率的高低，而選擇高利潤領域投資的情況。所以上章所介紹的農業、金融或工業方面的發展可以說都是資本主義的不同面貌。資本可以依著在貿易、農業、金融業、工業各部門間之比較利益而自由選擇投資。這種轉換與調適力，就成為資本主義的本質。那一個國家或那一個企業能夠用這種方式累積資本財富，那麼這些國家或企業也必然是相對的強大。

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歐洲取得了優勢，因此在對外方面，歐洲各個國家也必然要把他們的產品運銷到國外去賣；一方面，他們又必須在海外找尋低廉的勞工與原料以尋求更有利的生產條件。所以資本主義的制度必然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飄漫繁衍到世界各地了。

資本主義在初期的海外拓殖中除了強迫落後國家接受它外，並且也進而改變了落後國家的各種政治經濟制度。譬如說，落後國家大抵以農業為主，原本這些農業生產是為了生活所

必需。但是演變到後來，原來一些生產主食作物的農地，很可能大部分都改成種植列強國家所需要的產品，如棉花、咖啡、茶等。非洲今天的苦況與此有極大的關係，我們將在後面再詳細討論。再者，落後國家為了不想在技術或貿易上受制於大國，也可能急起直追，發展工業。這樣的結果，自然促使這個國家結構發生根本性的變遷。台灣從光復後就是一個極明顯的例子。上述這些情況，事實上從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之後便已存在，其後影響面則逐漸擴大。除了上述這種情況之外，另外最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中有各種不景氣與繁榮的循環週期。這種週期在十六世紀便已隱約存在，但從十八世紀，亦即英國成為霸權時期後才逐漸的顯著。

一、經濟景氣循環及其成因

景氣循環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成長所發生的。如果我們能對這種景氣循環更了解一些，那些我們對資本主義的本質也必然可以有深一層的體會。這種循環的主要原因是在資本主義營利驅動之下，生產力不斷的增長，製造產業各部門以及消費等彼此不平衡現象，必然發生經濟變動（也就是說生產與消費無法配合的剛好，有時生產過剩，造成產業危機；有時生產不足而不利消費者）。但是對於這種變動，歷來學者各有不同的觀點和解釋。依照

熊彼得 (J. A. Schumpeter) 的說法，所謂循環是指經濟情況有繁榮、衰退、沈滯、回復四個現象。他認為，繁榮期的特徵，就是就業率和生產量增大，物價高，貨幣所得增加；衰退期的特徵就是就業量減少（即大量失業），生產縮小，物價下落，貨幣所得減少，經濟活動陷於麻痺狀態，引起恐慌，進入不景氣局面；沈滯（蕭條）期的特徵是，就業量和生產量小，物價低，貨幣所得更少；回復期的特徵是，就業量增加，生產擴充，物價上升，貨幣所得增大，便進入繁榮期，如此，周而復始的循環。

從歷史上來看，用不同的指標（如銀行貸款數、利率、物價、躉售物價等）觀察，會發現有不同週期的循環，我們無法在此一一介紹。底下我們試舉出一種，根據十九世紀以來統計資料作成的景氣循環（包括物價、貨幣供給額、利率、技術、生產量），一個週期約六十年。這是由一位名叫孔挾提夫 (N. D. Kondratieff) 所發現的。根據他的說法這個循環的時序如下（註一）：

繁榮期	衰退期
一七五〇—一八一〇	一八一〇—一八四〇
一八四〇—一八七〇	一八七〇—一九〇〇
一九〇〇—一九三〇	一九三〇—一九六〇
一九六〇—一九七〇	一九七〇—一九八〇

而法國的年鑑學派 (Annals School) 甚至認為這個週期現象在十八世紀之前也可發

現，亦即加上：

繁榮期	衰退期
十六世紀早期——一六二〇／五〇	一六二〇／五〇——一七二〇／五〇

到底那一種循環才算有依據以及循環如何產生的解釋，百年來有許多的爭論，由於涉及了較複雜的討論，此處不再一一說明。但是假使我們用一個較長遠的眼光來看，那麼一般認為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末葉（一七八〇年）與一八〇〇年之後的循環之主要差異在於，前階段是以農業為主的社會，而後者則有了明顯工業化的內容。雖然皆有循環的危機產生，但前者主要是因為糧食欠收，由於欠收而導致穀價暴漲，這時的價格上揚，對當時城市與鄉村之消費者皆無助益。同時因為欠收，農村生產者扣除了生活必需之外，再無餘糧可供出售，因此十六至十八世紀間歐洲各國國內，價格（主要指糧價）與豐收年呈相反的關係，亦即，豐年糧價跌，凶年糧價漲的定律。

但自從十八世紀末之後，這種緊密的關連已不復存在，因為傳統農業的欠收之無常性為農業技術改良與運輸克服大半，因此不再是主導的力量。一七八〇年後的循環，我們若歸納近人的解釋，主要有三點：第一是工業技術的耗盡（亦即舊有的技術，因為許多廠商加入生產，致產量增加，價格因之下跌，而漸無利潤）；第二是資本過度膨脹，致生產超過消費需求；第三是初級農工產品生產過剩。上述這三種描述實際上又都是針對一個共同的特徵而發，亦即在全球的資本主義過程運作中，出現了供給與需求不調和的現象。這也就是說，全球性經濟景氣循環的產生，事實上可用總供給與總需求的不調和來解釋。底下我們稍作一些深入的解釋。

從資本主義體系來說，生產者追求資本累積，生產的項目將端視價位的高低而定，當某種產品處高價位，有利可圖時，其產量自然增加。然而當某種產品產量擴展後，除非全球的需求改變，否則進一步的生產適將自動減少了這一產品存在的理由（即供過於求而無利可圖）。問題是，生產不會刺激需求嗎？我們不是常聽說用廣告可以刺激消費者購買嗎？從全球的觀點視之，答案是不會。因為需求是工資及薪資收入的一種功能及反映，你收入的錢大抵就決定了你的消費能力。而工資和薪資不似（生產）供給本身由企業個體追求利潤所決定，它是由社會政經結構（階級或階層等）所決定（註二）。簡單地說，就是每一種職位的收入在整個社會中大抵是固定在某一位階上，很難大量的變化的。因此需求大抵是固定的，除非，社會的政治結構改變。包括社會的崩潰、科技革命、政治革命等。總之，供給的變化

一般是呈連續性，需求變化則需視結構的改變與重組，因此是不連續的。

然則這種需求與供給的不平衡其過程又如何生出波動呢？原來資本的自我擴張本質中並存有內在自我限制的矛盾。當全球生產者為追求利潤，無限制地生產時，相對於穩定的世界有效需求，終必導致生產萎縮。所以理論上，經濟停滯必然尾隨於經濟擴張之後。同樣地，經濟停滯亦必發生於擴張之前，因為停滯提供了資本集中的時機，因為部分企業倒閉，部分企業則透過兼併以維持其生存。此舉反而促使資本鞏固與集中，提供了為下次經濟復甦鋪路的新秩序。同時在停滯狀態中，各階級與階層必因衝突重組而促使所得再分配。這種再分配，換句話說，比較起衰退的階段，就是需求增加。並且資本主義體系必然在落後的邊陲地區和國家創造新的低資工人和原料以求補償和苟延圖存（註三）。所以研究全球景氣的循環必將觸及世界經濟中核心國家與邊陲落後國家的分工問題。底下我舉一個例子，就容易懂了。例如在十九世紀末整個歐洲產生了經濟的危機，許多工廠因為上面的因素而關門，這一倒閉，就使許多人失業了，社會也更加不安，這當中有些資本較大或在海外還有一些賺錢的相關產業的國內公司就比較能支撐，他有時還可用極低的價錢收購那些倒閉的公司以待景氣復甦，有時則以技術改良減少成本，有時更可利用海外殖民地中相關的行業提供他廉價的原料（由於落後地區勞工便宜等因素）來減少生產的成本，這一作為很明顯地表現了資本主義水銀瀉地、橫跨全球的本領。這與中世紀用武力征服別人的行為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視為一個整體的歷史系統，是很有意思的一種看法。所謂的停滯，事實上是這個系統存在的必要原素，就如同人體呼吸一樣，在繁榮時期，吸入「創新」、「投資」、「擴張」的「氧」；在衰退時期，則呼出「無效率的生產者（線）」之「穢氣」。因此孔挾提夫週期的循環正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生命線。

二、資本主義與霸權國家的興衰

其次，我們如果將資本主義經濟和歷史上國際政治體系連結來看，將可發現一個極有趣的現象。

在孔挾提夫的頭兩個週期中，眾所周知是屬於英國霸權（霸權指在各個先進國中在生產、商業、財政與軍事力量獨強的國家）時期。第一個週期的繁榮時期（一七八五／九〇—一八一〇／一七），由於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使英國取得領導地位。當衰退時期來臨時（一八一〇／一七—一八四四／五一），因為國內企業對初級原料需求孔亟，競爭過度，促成英國建立了自由貿易體制（Free-Trade System），這種自由貿易制度與今日美國所倡的差不多，但要出現這種制度也不是容易的。因為跟其它國家一樣，有些國內產業缺乏競爭力不喜歡脫離政府的保護，所以不喜歡自由貿易、國際競爭的環境，所以一定拚命地

反對。另一些有競爭力的產業，尤其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產業，就十分歡迎這種制度。這兩者之間的較勁，在英國是表現在國會的辯論和遊說之上，當然後者後來終於在一八四〇年代在英國國會取得優勢，而通過了這項制度的種種立法。這種制度安排強化了英國工業與世界其他主要農業國（中國、印度、東南亞、非洲等）互補的關係，也因之舒緩了英國國內的競爭壓力。但這種體制安排連帶地使英國步入了第二個孔挾提夫週期的運輸革命（或上章所說的二次工業革命）之中。假如第一個週期的特徵是英國在國際體系領導地位的獲得與鞏固，那麼第二個週期便是英國趁勢主宰了工業生產的領先地位。在一八四四／五一—一八七〇／七五的繁榮時期之中，運輸革命充分地開展了大英帝國與邊陲地區的互補關係。故此繁榮時期中，充滿著繁榮景象，競爭壓力十分和緩，因為它的海外貿易中的產品技術，其它國家很難望其項背。但是到了一八七〇／七五—一八九〇／九六的衰退時期中，新一回合的國際與國內競爭（包括產品出口與原料取得）又起，因為在此衰退同時，各國的技術也逐漸追趕至類似的水準。在這次衰退時期（一八七〇—一八九〇）的競爭與前期有些不同，因為世界政經結構的安排已非單一而是多重的。這一期中，美國與德國加入了競爭的行列。英國為求自保，企圖在與國間建立一種新秩序，以維持其領導地位。英國很明顯地逐漸喪失了工業上的領導權，但是仍試圖鞏固它在貿易、財政與政軍的領導角色，最後它選擇了維護自由貿易體制與鞏固海外軍事控制力量等雙重手段。

這種手段適與德國國家主義政策衝突。德國在內部加強國家的統馭權力，並以資整合國內企業，對外則強調國威，積極與英國競爭。這種政策的內容殆近乎過去的重商主義（見前章）。這道理是很明顯的，德國在十九世紀前遭受強鄰的瓜分侵略，到了十九世紀末才好不容易地統一，所以它的國內情況與英國不太相同。英國可以說是資本家在海外打頭陣，政府則幫他掃除障礙，反觀德國為求國家的富強，一般人也大致接受由政府領導計畫與其他強國相抗衡的作法，這種發展是一種由上往下的方式。這種方式很受一些經濟落後國家的青睞，例如民初，國父便很欣賞這種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

至於美國在十九世紀末的衰退時期中，所採之策略既非自由貿易亦非重商主義，而是以資本家的企業加強市場的內化（internalization）與吸納，這也就是說，它注重國內市場的程度超過對國際市場。這種方式與德國模式不同，它在利潤的增加速率上洵非以國家強制力所創造的可以比擬（註四），因為國家強制力有一定的極限。企業體終究而言，還是以利潤為它最大的動力來源，這也是公營事業效率常不及私人企業之處。因此，美國在國際間強調門戶開放（open door）（類似自由貿易的主張，並且不贊成劃分中國「勢力範圍」的作風）的立場是十分自然的事，此舉足以在強權對峙之下，保護貿易的通暢以及維護資本企業。這種策略不同於自由貿易之處在於，它能預設與忍受國際間的保護限制。美國採取這種獨特的回應模式係根植於國內的組織革命（Organizational Revolution），這種革命表現於生產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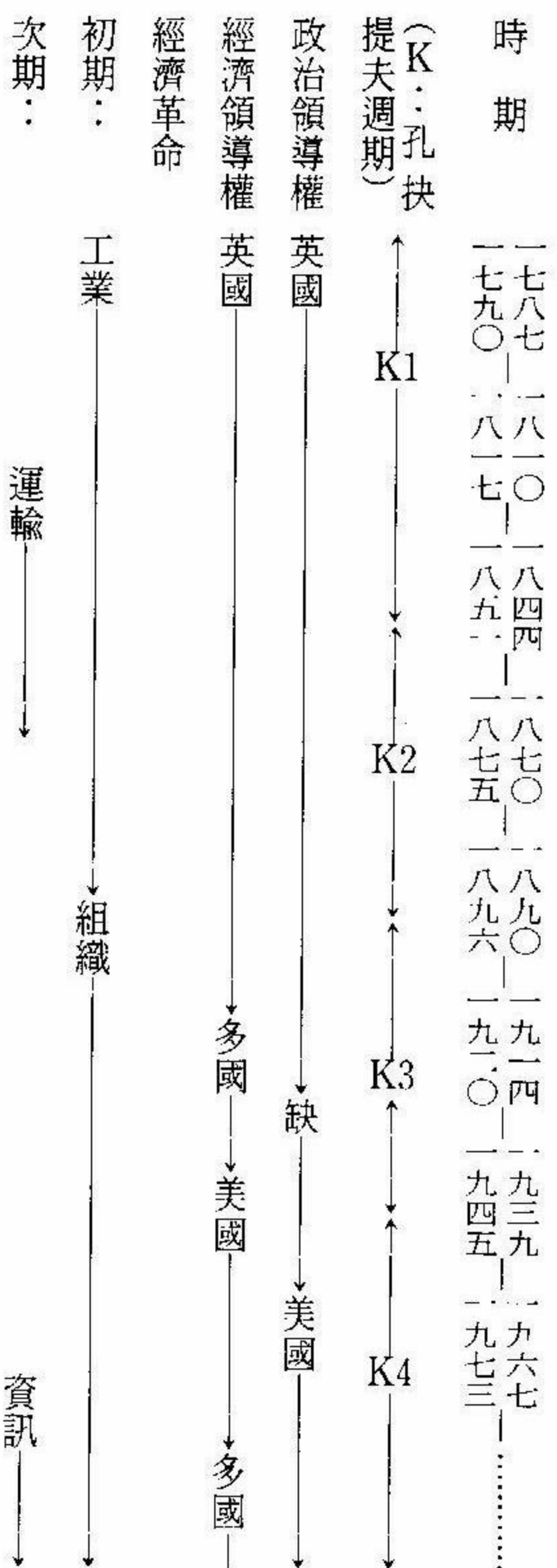
程管理聯結的建立以及企業組織中經濟創新的制度化，當時英國的家族企業作風仍舊保守，故為美國所超越。

組織革命使美國繼英國之後取得霸權，但不同的是，英國過去在經濟上的領導權與其國際政治優勢係同時開展。工業革命的繁榮時期（一七八五—一八一〇）正是英法拿破崙戰役的最後階段（一八〇五年，英國納爾遜摧毀法國海權，一八一四年，聯軍陷巴黎，拿破崙退位可資為證）。而美國組織革命的繁榮時期中，美國尚未獨霸，當時反倒是英德之間的爭雄。這種經濟競爭與霸權抗衡的異時性，說明了國際政治體系並非是決定經濟領導權的唯一因素。

由於這種霸權與經濟實力的不吻合，第三期的孔挾提夫週期可說完全處於世界核心國的敵對 (rivalry) 狀態 (亦即是存在數個實力相埒的強國狀態)：一八九〇／九六一一九一四／二〇的繁榮時期中，國際經濟的主要競爭仍介於英、美、德之間，此時經濟繁榮之因，不僅是競爭行為的節制 (如同先前的繁榮時期)，同時也是軍備的花費驟增。隨著一次大戰的爆發，接續的衰退時期 (一九一四／二〇—一九三九／四五)，競爭主要表現於國際政軍勢力而非經濟商業方面，比諸前期實有不同。美國在一次大戰與經濟衰退期中取得了世界經濟的霸權地位，並且由於自由貿易制度與新重商主義不足以應付國際政治，美國亦在同時躍昇為世界軍事強權。

在美國霸權之中，跨國的投資取代了自由貿易模式，亦即資本家企業的跨國擴展取代了進出口的方式。第四期的孔挾提夫週期繁榮時期中，十足展現了這種新秩序的安排。同時各國與美國的競爭亦刺激了繁榮之局。值得一提的是，本期產生了一種革命，一般稱之為資訊革命 (Informational Revolution)，這種革命產生的目的在於建立與加強美國公司與世界經濟中其它國家互助合作的連結。但是美國的優勢隨即為日本、西歐與蘇聯追平。一九六七與七三年間，世界經濟又步入另一衰退期。區域性的國際經濟聚合遂成為本世紀末之特色，此表示了美國成為惟一霸權的局面已一去不返。總體來說，自十八世紀以來，英、美兩個霸權大致各主導了兩個孔挾提夫週期的時間。

以上孔挾提夫的四個週期，因之又以下表列明 (註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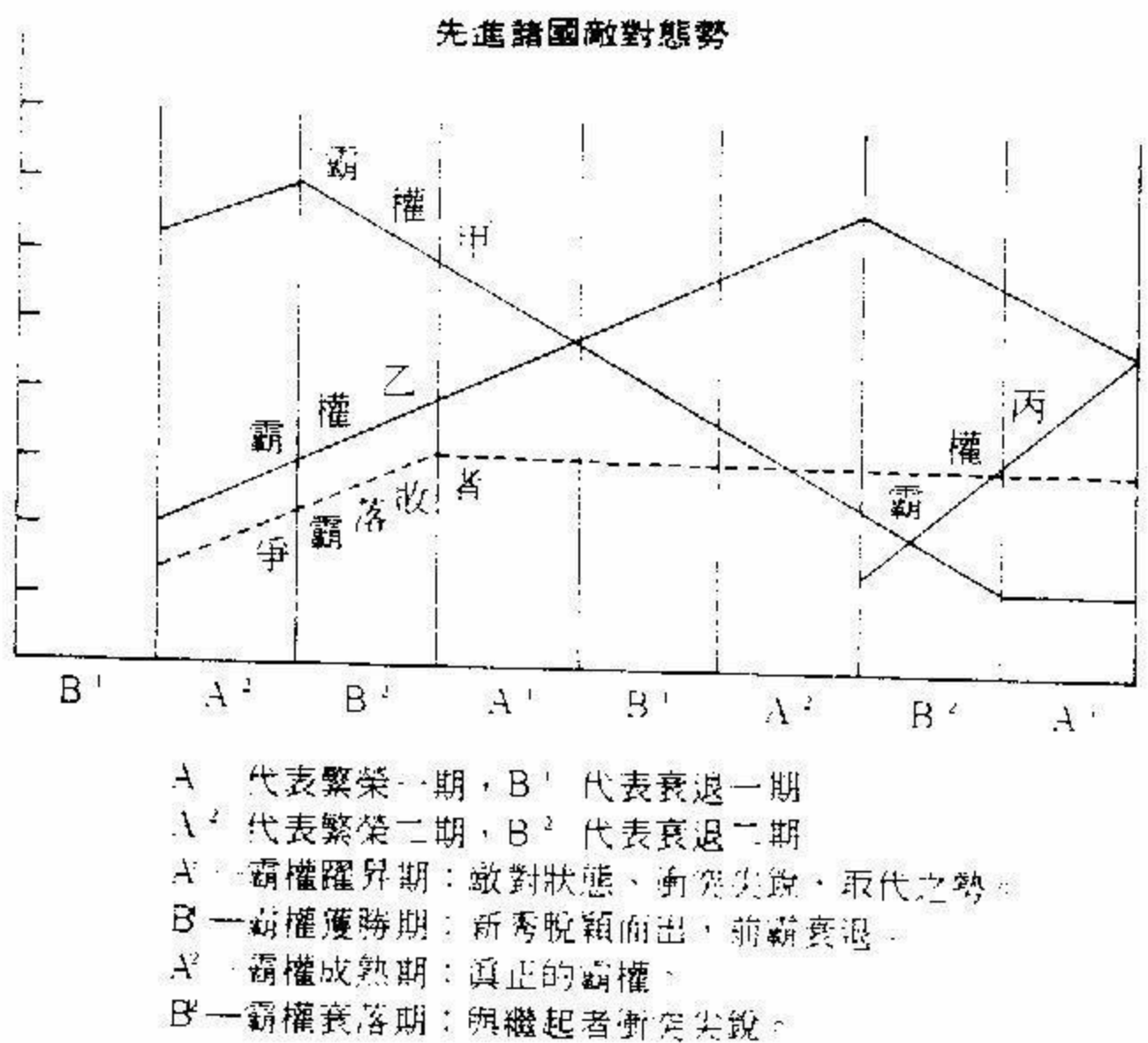
針對上述的歷史事實，我們可以從中發現經濟景氣週期與各國的霸權是有關係的。那一國家能在世界的資本主義體系中取得經濟領導地位，那麼它的國力也必然是強大的。基於每個霸權（十九世紀英國和廿世紀美國）都大約主宰了兩個孔扶提夫週期（約一世紀），所以我們如果能對這種關係有深一層的了解，那麼這對我們的鑑往知來將大有助益，但是由於這裡頭牽涉了相當複雜的討論，無法在本書中充分說明，所以我們目前祇要有一些粗淺的印象就可以了。

西歐在近代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其各國國力相當、不分高下的時期是較普遍的，獨霸的情況則不多，祇出現於部分時期。俗話說，江山代有才人出，而國家之間相互競爭也差不多是如此。每個國家合縱連橫莫不想爬到獨霸的頂峰，這種結局常需以其它國家的衰落或沈淪作代價。而獨霸的地位也不可能久存，月換星移的結果，總是存在著一些興亡的規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在國際競爭中比他國累積更多的資本，那他的衰頹便是可以預期的了。

六： 因之我們可發現孔扶提夫週期與國際體系相聯結的關係大致如下（并見下圖）（註

其中， A^2 時期為霸權成熟期，表示其各方面競爭能力皆優於其他先進國，故傾於倡議自由貿易與國際體系的開放，因為他不怕與其他強國競爭，同時這種貿易比較不易引起弱國的痛恨。 B^2 時期則是先進國爭奪殖民地與採取關稅保護時期，因為本時期中，強國貿易和商品技術實力相當，爭奪市場的結果就是動粗而放棄用自由貿易的斯文架式，同時也為了保護本國的產業免得別國商人傾銷，各種關稅和阻撓的動作也就紛紛出籠。

根據歷史事實的演進，上述的關係模式，亦可回溯至一四五〇年。但這個模式並非完美無疵的，舉例而言，如下圖之IIa時期，正是英法爭霸時期，並無任一核心國取得霸權；並且IV美國在 A^1 時期中亦並未真正取得包括政、軍方面的霸權地位。其情況略如後圖（註七）。



霸 權	I：至(西班牙) 哈斯堡王朝	II：尼德蘭 (低地國組合)	III：大不列顛	IV：美國
A ¹ (霸權躍昇)	一四五〇—	一五七五—一五九〇	一七九八—一八一五	一八九七—一九二二
B ¹ (霸權獲勝)		一五九〇—一六二〇	一八五—一八五〇	一九一三—一九四五
A ² (霸權成熟)	—一五五九	一六二〇—一六五〇	一八五〇—一八七三	一九四五—一九六七
B ² (霸權衰落)	一五五九—一五七五	一六五〇—一六七二	一八七三—一八九七	一九六七—

II_a: A³ 一六七二—一七〇〇 B³ 一七〇〇—一七三三 / 五〇 A⁴ 一七三三 / 五〇—一七七〇 B⁴ 一七七〇—一七九八

另外，如果特就霸權而言，霸權在歷史上的興起必須具備下列數項因素：(一)生產利益的集中化，資本家都覺得在這個國家投資利潤很好、很穩定。集中化的條件部分是因為當地的科技與組織在某一時期內較適於世界經濟的規模，在此地生產符合世界貿易的需求。(二)在世界經濟的地理上居於中心位置，特別是運費偏高的時期，像英國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三)國內市場與世界經濟的規模有些相關且相當平衡。(四)國家的領土必須大小適中。(五)在世界經濟內國中的階級利益緊密連結及國家有追逐國際政經利益的企圖。至於霸權衰微之因亦有下列數點：(一)成功的資本累積之後導致政治上的需索、非生產活動的增加以及勞工組織要求加薪，因此促使資金外流到其它先進國家去。(二)先進國在外國的投資相當競爭，風險亦高，這就是

為何霸權無法永久地以國外投資作為鞏固其地位的原因。(三)固定資本(如工廠、運輸系統、城市公共工程等)的周轉調整時間長，延緩其競爭力。尤其是愈大的企業，當它要變更生產熱線和提升技術內容時，就顯得力不從心，就像要一個巨人做出靈活的動作是同樣的道理。(四)霸權的「國際成本」(指國際金融秩序的建立及強制機構的維持，如過去英國之於印度、法國之於北非)，隨著擴張愈發顯得沈重(註八)，因此我們可以說霸權的興衰都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性擴張與加深而不斷上演。未來我們在觀察國際政治局面時，經濟仍舊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東歐的改革與蘇聯的解體之後的廿一世紀國際局勢更是如此，資本主義制度更進一步被原先這些共產國家所接受，連中共也不例外。

三、資本主義下的先進國與落後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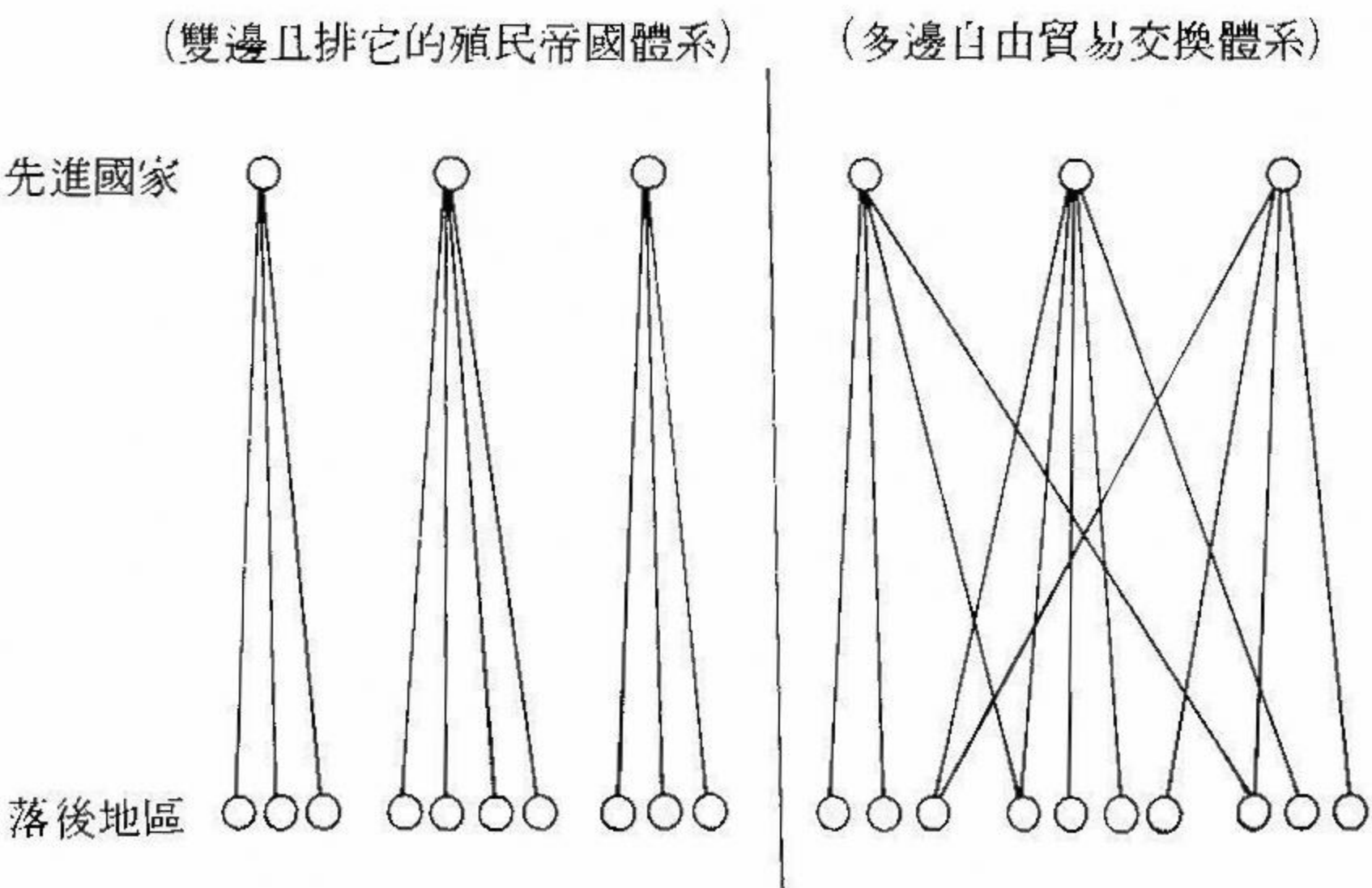
其次，我們進一步來探討強國間競爭所導致的狀態對落後邊陲國家的影響。從資本主義經濟面來看，先進國與落後國的關係實包含了其間的分工，分工指的是，先進國提供高科技和資本大的產品，落後國則提供原料和勞力密集的產品。這種分工狀態程度上為權力的依賴(弱國依賴強國)結構所支持。一般而論，歷史上先進國對落後國的控制結構有兩種形式，彼此相互輪替運用：一種是程度上為多邊自由貿易的系統，另一種是雙邊且排他的殖民帝國

系統，其關係如下圖所示（註九）：

每當獨霸時期，核心與邊陲的關係必較傾向於多邊的交換和控制結構，同時在國內政治上施行的是程度較高的自由主義，政治上比較民主，在經濟上則主張自由貿易，這是因為霸權在生產力上強過其他核心國，自由貿易自然對其有利，有時甚至利用其政軍力量，打破阻礙世界市場之樊籬。相反地，在敵對爭霸時期，大家的貿易與科技能力不相上下，於是各國就傾向於雙邊的交流結構，視其先佔的落後國家為禁臠，不准其它強國染指。其在國內則採取各種保護措施（包括軍事和關稅等），對外則擴張領土。其關係如下圖所示。過程中，每當霸權在邁向巔峰之時，貿易利得亦最大，故它偏好「殖民的自治化」（亦即讓殖民地享有更大自主權）。當他成為霸主之時，落後地區的民族主義有了另一層意義，它的合法性是被霸權所默許的。霸權以文明的形貌，享受經濟的利得，這時可稱之為「經濟的帝國主義」，這是因為霸權國家如過去的英國，由於經濟力強大，它犯不著用武力去鎮壓當地的住民，這樣不但容易引起反感和仇外情緒，同時自己也要花很多經費維持當地的行政司法和軍隊等機構，這樣會把自己拖垮。法國在十九世紀時的手段就是這樣，所以當地的反抗也就多了。如果自己是獨霸，則大可以經濟來往作累積國家財富的手段，落後地區人民的痛感也較不直接。可是當霸權力量盡失時，另一波的殖民化重新開始。在霸權衰落之中，其它的核心國家或半邊陲國（指國勢大約比強國差一些的，如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和日本）將會採取數種措施，競以爭雄：（一）為加強世界市場產品的自由競爭力。（二）樹立重商主義關稅保護等樊籬。（三）加強對邊陲地區的政治控制等（註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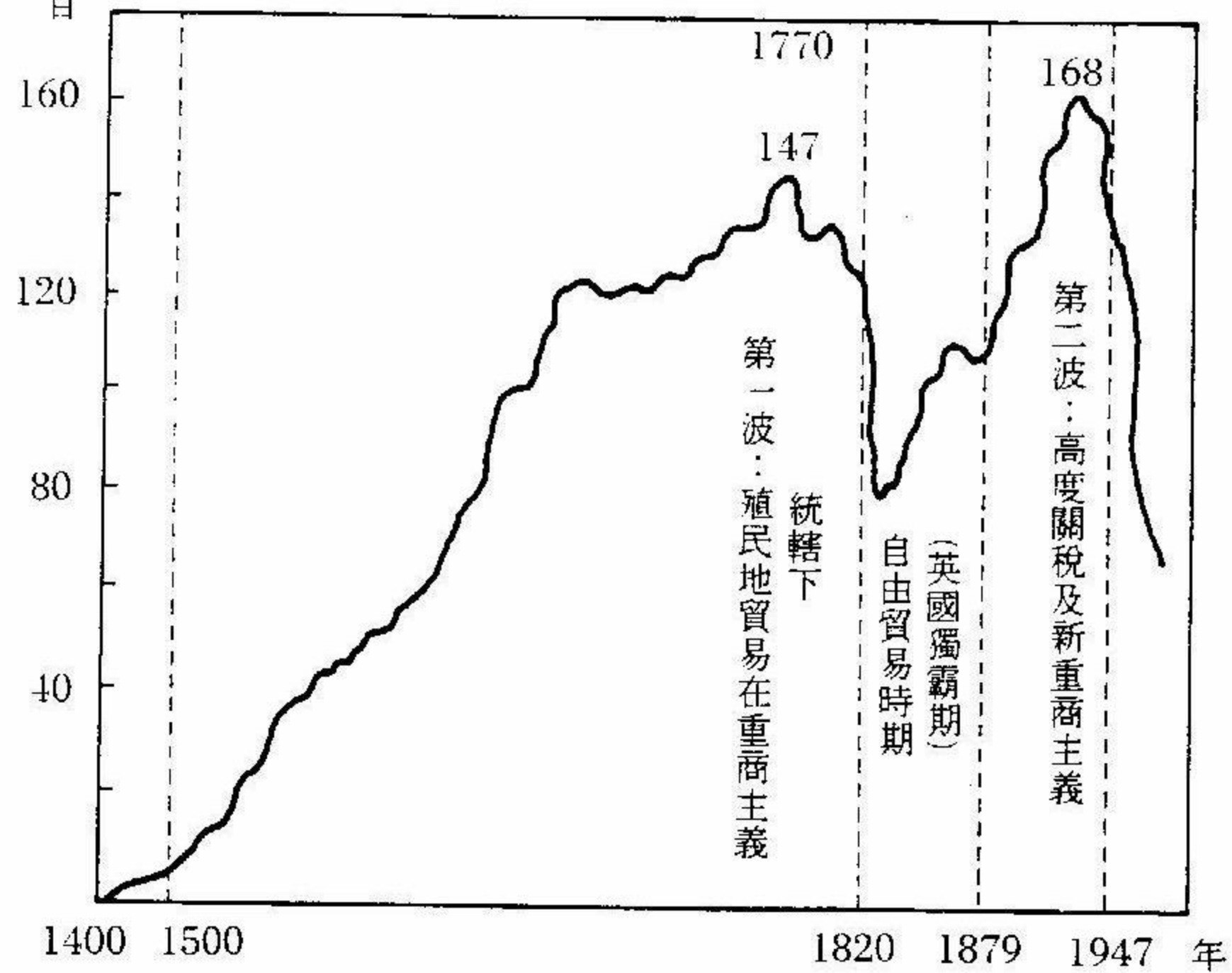
這樣的模式，我們可在歷史上找到證據，按伯傑生教授（Abert Bergesen）的統計，從一五〇〇年起至一八二〇年止為第一波，殖民地總數在一七七〇年達最高峰，計有一四七個地區淪為殖民地。在第一波結束後一直到一八七九年左右是一段自由貿易時期。第二波是從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七年間，此時又有新的關稅等保護政策產生，另一種重商主義的新形式又出現，在此期間，核心國實力相埒，殖民地之擴展又成為核心國競雄的目標。其過程如下圖所示（註十二）。

從十六世紀開始，西班牙和葡萄牙由於瀕臨大西洋與地中海，首先開展了殖民之風。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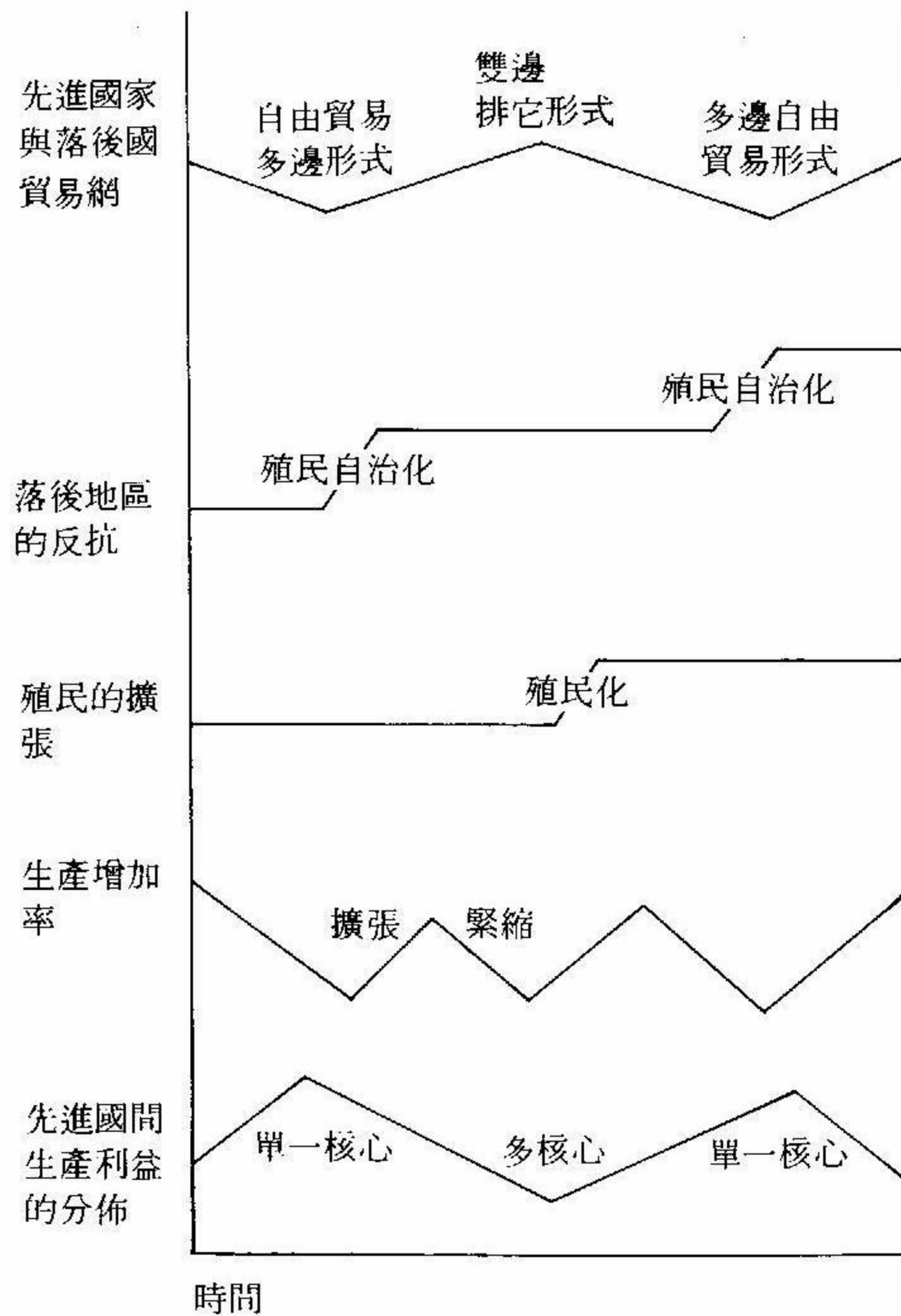


們以強大的海軍維持海上貿易路線的通暢，並鞏固所佔領的土地，以保證奴隸、香料和金銀的來源不絕。其它國家亦相率跟進，凸顯了歐洲物質匱乏及海外早期擴張的相互關係，而各國不止競雄海外，尤爭戰歐陸。在爭霸的過程中，表現於海外的侵略和「新發現」行動與年俱增。直至十七世紀中葉，低地國尼德蘭取得歐洲商業、運輸中心，並憑恃精良的海軍守護船來漁利之際，殖民地增加數目稍斂。及至荷蘭於十七世紀末衰落，殖民地數目

重商主義與自由貿易對殖民地擴張之影響圖



先進國互競與先進——落後國關係結構圖



英、法競起之時，後兩國之殖民地則互相緊臨，數目又告增多，至一七七〇年達最高峰；然而到十八世紀二〇年代，英國獨霸，大倡自由貿易之際，全球殖民地數目則大幅滑落，一如前頁附圖所示。

一八四〇年，英國以海軍衝破閉關自守的中國，逼使其成為新式產品市場及原料之提供區。所以英國在南京條約中要求中國割讓蕞爾小島——香港做為自由貿易的根據地，並開闢五個口岸允許自由通商。

一般而言，在霸權時期，邊陲與核心的貿易關係主要是導向自由貿易，因此於十九世紀，中西近代史，大致上可以說就是中英關係史。一八四九年後德、法、比、荷雖曾一度傾向自由貿易，然而等他們發覺英國產業發達並不是源於自由貿易，反而自由貿易是產業發達之結果後，各國無不再度實施關稅保護且擴張其殖民範圍。在核心國家競爭重現時，邊陲地區的個別國家就被涵蓋到某個特殊的勢力範圍或某個關稅區域中。一八九五年以後的中國，其情況確係如此。

從統計資料顯示，在一八六〇至一九一三年間殖民地擴張熱潮中，計有英、法、德、蘇、美、義、日、比利時、西班牙、奧匈帝國等國家佔領全世界七十餘個地區，其中以英國二十四處、法國十六處為最多，遠超過全數的一半。以中國為例，一八六〇年失去烏蘇里江區域，一八九五年失去台澎，一八九八年英、法、德、蘇、日分據中國沿岸城市與地區，作瓜分中國領土之前奏。史跡斑斑可考諸如上述。所以中國在與西歐先進國家接觸後（主要是英國），在一八四〇至一八七〇年代間，是英國獨霸時期，也是自由貿易時期，英國要的是通商口岸，但是在—一八七〇年英國的國勢遭受其他國家（如法、德等）的挑戰而失去優勢時，它就和其他國家一樣一起爭奪殖民地了。中國在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間被劃分成一塊一塊的「勢力範圍」，就是一種殖民地的類型。這與一八四〇至一八六〇年間，光是要求通商口岸的訴求是不同的。而這個不同的遭遇也正好說明了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先進國家的政經關係所加諸於中國或落後地區的影響。

附註

①N. D. Kondratieff, "The Long Waves of Economic Life," *Review of Statistics*, VXII, 6, Nov.1935, pp.105-115.

②I. Wallerstein, "Long Waves as Capitalist Process", *Discussion Paper on International Round Table on Long Waves*, Paris, Mar.17-18,1983, p.13.

③Eric Hobsbawm,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Socialist*

Anthropology, II, May 1977, pp.87-106.

㉔ Alfred D. Jr.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1977.

㉕ 四個階段的遞進與未來・與Giovanni Arrighi, “Custom and Innovation: Long Waves and Stag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a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Factors in Long Term Fluctuations,” Certosa di Pontignano, Siena, Dec. 15-17, 1986, pp.7-13

㉖ T. K. Hopkins & I. Wallerstein, “Cyclical Rhythms and Secular Trend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Some Premises, Hypotheses, and Questions.” Discussion paper 1978. 08, Colloquium on Crisis in the World Economy: Past and Present, Starnbery (F. R. Germany), p. 17

㉗ T. K. Hopkins & I. Wallerstein, *ibid*, 1978, pp. 18-19

㉘ Christopher Chase-Dunn, “Core-Periphery Relations: The Effects of Core Competition” in B. H. Kaplan (ed.), *Social Change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London: Sage, 1978, pp. 161-162

㉙ Christopher Chase-Dunn, *ibid*, p.163

㉚ Christopher Chase-Dunn, *ibid*, p.170

㉛ Nicole Bousquet, “From Hegemony to Competition: Cycles of the Core” in T. K. Hopkins & I. Wallerstein (eds.), *Process of the World-System*, London: Sage, 1980, p.50.

㉜ Abert Bergesen & Ronald Schoenbery, “Long Waves of Colonial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1415-1969,” in A. Bergesen (ed.), *Studies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Y. : Academic Press, 1980, p. 240.